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9月13日第21期

总第16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67期

林彪研究专辑（二）

目录

【专稿】

向红 “身逐塞鸿来万里，手披荒草看孤坟”

——探访“九一三”坠机现场

【林彪研究】

越人 林彪与七千人大会

——兼论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高层政治互动与博弈

丁凯文 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

【史实辨析】

蒋健 再谈林彪专机的“黑匣子”

蒋健 “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考

——兼谈历史要靠“性”来生动吗？

【读者来信】

1. 横泽泰夫谈老舍专辑

2. 范世涛谈“红八月”的自杀

3. （荷兰）庄菁瑞谈与老舍相关的往事

4. 李素白、郭力、李辅谈纪念老舍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



向红，原名周向红，1954年出生，退休干部，原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之女。（周宇驰是1980年特别法庭审理的林彪反党集团一案的主犯之一，林彪之子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571”工程纪要》的主要作者，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周与于新野在北京怀柔一道饮弹赴难。）1970年入伍，“九一三”发生时未满17岁，就读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因父亲原因，1971年-1974年被多次办学习班，大学毕业后不予提干，强令复员。待业时被非法关押，成为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对象。解除关押后，在空军司令部生产队劳改两年余。现居上海。笔名向红、于鹏飞。著有：《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2009，《记忆》第27期），《昨夜星辰——怀念张云生叔叔》（2011，《记忆》第76期），《四十年有感》（2011，《记忆》第77期），《“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一）（2012，《记忆》第91期），《“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二）（2013，《记忆》第92期），《“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三）（2013，《记忆》第94期），《我的文革》（2016，《记忆》168期）另，其所整理的史料《王维国遗稿》刊发于2011年《记忆》第76期；整理的《中央学习班·周向红专案》刊发于2016年《记忆》第168期。

“身逐塞鸿来万里，手披荒草看孤坟”

——探访“九一三”坠机现场

向红

Монгол Улс——蒙古国，一个在45年前把我们的命运永远定格在她辽阔草原上的国家，

45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召唤和吸引着我。今年终于有了机会，却是安排周密的生态游，想去温都尔汗祭奠的愿望十分难以向别人启齿，临行在即，当先生问“要不要安排去温都尔汗看一看”时，我一下子抱住他的后背，哽咽了。后来听蒙古国的朋友说：凡是来的中国人都愿意去温都尔汗看一看。



(蒙古国大呼拉尔-国家议会)

在机场免税商店里被告知蒙古国不限制烟类和酒类进口的数量，欣喜之下立即被各种酒类映花了眼，很难确定用什么酒祭奠，我问营业员：有没有适合军人的酒？她推荐了“人头马”，想了想还是感觉不太理想。最终挑选了一瓶蓝色精装的“北京红星二锅头”，只因为“北京”代表了祖国，“红星”代表了理想，

而耀眼的蓝色就象征着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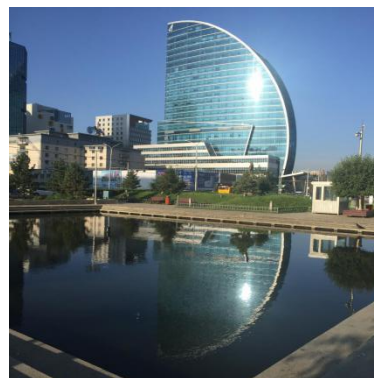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约330公里，必须开车前往。当地朋友很热情，说车子和鲜花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便带“司机”乌吉来见我们。粗壮的乌吉吃饭时从头到尾我们彼此只能笑一笑、点点头，他不懂中国话，我们是一句蒙古语也不会说，于是他建议“明天去带一个翻译”，我们如释重负，马上同意了。

(乌兰巴托 成吉思汗广场一角)

晚上在酒店，我铺开酒店的信签纸，分别写下了三张不同的内容，准备明天带上。

是日心绪纷乱，唐代刘长卿的七律《送李将军》，准确地描绘出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征西诸将一如君，报德谁能不顾勋。身逐塞鸿来万里，手披荒草看孤坟。擒生绝漠经胡雪，怀旧长沙哭楚云。归去萧条灞陵上，几人看葬李将军！”

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甚满意，深夜方才搁笔。今天是我们的建军节，“九一三”事件的遇难者都是军人，选日子不如撞日子，明天能去祭奠他们显然更具深意。



2日一早如约，翻译乌苏合是比乌吉高大一些的汉子，有些腼腆，他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连比划带说我才明白他的意思，这样的汉语水平让我自清晨起就很沉重的心里更是凉了半截，但此时再无退路，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他们先带我们东绕西拐来到一家刚刚开门的花店，秀丽的女老板和乌吉他们打着招呼，显然已经得知我们要来。我完全没有头绪地看着女老板整理着一大束白色百合花，不知道自己要买多少。45年了，莫非45朵百合？女老板答复说：“没有那么多。”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我在店里转了一圈，果断地买下了白百合、白玫瑰和黄色的雏菊各9朵，3个9一束花，暗含着“九一三”，我很满意自己的决定。女老板亲自包装，我选了紫色的衬纸和丝带，想那一望无际的绿色中，没有比紫色显得更艳丽、更出挑的颜色了。

路上我问才三十多岁的翻译：你们知道温都尔汗那里发生了什么吗？他回答：听说是中国的第二号大人物“林彪”的飞机失事了，有好几个人，埋在那里……。“林彪”这两个字的发音他说的很清晰，听得我鼻子发酸，我把脸埋进花束里，心里默念着“我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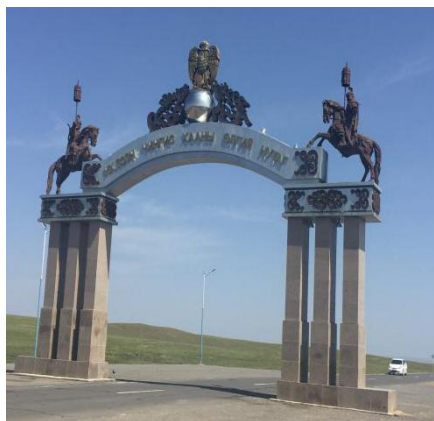
乌苏合看着我肃穆的表情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埋在我们蒙古呢？他们的家里人怎么到现在还不把他们接回去？我想了想回答他：当时你们国家想知道坠机上的人都是谁，而我们国家不想告诉你们，而且你们国家没有火化的习俗，所以我们国家就没有把遗体运回国。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很乱，嗯……你看，现在中国人想来蒙古都很不容易嘛！

乌苏合费力地理解着这些逻辑混乱的话，憨笑地点着头，却仍然是一脸不解。

望着他们年轻的脸庞，真不指望他们听得懂什么叫“批判”什么叫“打倒”，我在心里请求他们的谅解，我真怕他会再问“林彪为什么要飞到我们蒙古来”这样的问题，这恰恰是45年来国内一直没有弄明白的事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拒不承认飞机是军用飞机、不肯透露死者的真实身份、不能打消蒙古国方面高度怀疑256飞机“入侵”其领空是“执行一项特别任务”的疑虑等一系列不实事求是的外交“努力”，确是直接使得中蒙谈判陷入僵局、导致256机上遇难人员长眠于此的原因。

迎着朝阳，我们从乌兰巴托一路向东，车子离开了中央省，行驶在景色看不出变化的

草原之中乌吉精神饱满，车子开得又快又稳。因为语言不通，他除了和乌苏和聊天，车上的音响也一直放着歌曲，从独唱到器乐曲，有民族风格浓郁的长调也有摇滚和 Rap，显然（“成吉思汗的摇篮”）乌吉是个热爱音乐的人，乌吉边开车边跟着哼唱一两句，听得我



直感撩乱，驱散了长途旅行的寂寞。本来七天旅游下来，已经看习惯了漫山遍野的牧区景色，成群的牛羊马、蒙古包、炊烟、湍急的河流和林区，构成了一幅马背上民族的完整画面，不料却在此听到了如此与时代同步的音乐作品，很是意外。CD一首首放，乌吉就一首首哼唱，看来是相当熟悉这些曲目。

快到肯特省的一段路坑坑洼洼，我们的车离开公路沿着路边草原上的车辙印继续前进，这样颠簸了差不多五十公里，随着路旁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古朴的蒙古动物雕塑，一座牌楼式样的建筑物矗立在了道路中间。翻译告诉我们肯特省省会到了，因为这里正是成吉思汗的故乡，所以这个牌楼上写的是“成吉思汗的摇篮”；而令我们特别吃惊的是温都尔汗在两年前已经改名为“成吉思浩特”了（“浩特”即城市的意思），那个随着“九一三”事件而深入国人人心的名字“温都尔汗”从此载入史册，退出现实的舞台。

进了省会乌吉问我：现在去住酒店还是继续前往东北方向 70 公里外的苏布拉嘎盆地？我看了看天色说：继续开，今天跑一趟应该来得及。由于乌吉也是从未去过那里，他事先



（去苏布拉嘎盆地的路标）

先找了一个亲戚带路，约好就在离成吉思浩特和苏布拉嘎盆地之间的 26 公里处等候，这又让我担起心来，没有路标的地方，到底能不能找到呢？乌苏合体很贴地，让我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车子很快拐出城市马路，一头冲向茫茫草原。

车辙就是路。蒙古国人把“牧民”叫“牧区人”，我放眼望去，没有看到牧区人，偶见远处的羊群和马群自己吃着草，我的方向感完全没有了，感觉往哪里开都一样，干涸的湖和冬季里使用的羊圈一一闪过，唯有车里的GPS显示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和方位。乌吉照样边哼边开，前排比后排果然颠簸小多了，我也不再用照看花束，人比刚才放松一些了，望着前方无尽的草原，听着女歌手嗓音柔曼而辽阔的长调，咿咿呀呀地就像这条路没有尽头似的，既像一位母亲又像一个恋人，倾诉着自己的心声。这首唱罢，下一首的曲调却是欢快起来，彪悍的乌吉一改硬朗的模样，眯缝着眼摇头晃脑、捏着嗓子一字不拉地跟唱着，非常陶醉，我纳闷，不知道歌词是什么？

乌吉那位叫窝吉的亲戚和他的SUV终于出现在26公里处没腰的草里了，我一看仪表盘，正好累进到26公里。汉子们高兴地互相打招呼，递着烟，我们的心也放下了：一切尽在计划中，蒙古朋友很靠谱！他们抽完烟，我们随着窝吉的车上路了。

骄阳下他的车像撒欢一样跃上跃下，翻过了不知几个平缓的山包，又突然离开深草中浅浅的车辙斜插出去，我打量着一个又一个迎面而来的“盆地”，什么都没有发现，乌吉全神贯注，我们的车一步不落，

紧紧跟随，途中乌苏合用手指了一下右边车窗外飞速而过的（“九一三遇难者之处”碑）什么，说：那个矿。

当窝吉的车突然停下来，我看见了自己和车停在了一个周围三面被平缓的山包围起来的平坦的大草原上，窝吉笑着用手向四周一挥：256的坠机地点到了。这里不像几天前去的库苏古尔省那边的草原，草里的各种蚱蜢飞鸣，那声音像小钢锯在相互摩擦，发出金属般的尖锐噪音，热闹异常。这里草原的静极了，好像都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血脉流动的声音，一眼望去除了草就是草，那种空荡荡的感觉，说话的声音显得很弱、很散，好像马上



就被什么吸走了一样。真是这里吗？

窝吉像是看出了我的困惑，指着离我们北面几步远的一个地方冲我笑，我顺着他的手一下子看见了在没脚踝深的草里有一个高约70到80公分、厚约10公分的白色石碑，上部呈椭圆形，下部靠近地面则被蓝黄红三色绸缎做的花球围绕，像是保留了安放仪式的原样。石碑前面有数小把捆扎起来已经干掉的野花，像是在周边采集献上的，石碑周边散落着几只白酒瓶子、啤酒的易拉罐、罐头盒、一只平底搪瓷碗。石碑的正面从左至右竖着刻写的“九一三遇难者之处”，落款是“缅怀者敬立”，时间是“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石碑背后上面横着的两行是蒙文字母，下面是中文“历史不会忘记”；右边的落款是竖着的（256飞机残片）“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二时二十七分”。



我站在石碑旁边环顾这个盆地，这里不再像以往书中描述的那样是一片焦土，草已长得跟远处差不多高，只是有些稀稀拉拉。窝吉蹲下来用手划拉地面，我也蹲了下去，看到地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金属碎片、螺丝钉和高温融化过的金属凝块，还有数不清的玻璃渣子，翻译说：这些都是飞机上的，原来有很多，很大，现在越来越少了。我捡了几块，还有两块不知是256飞机哪个部位的玻璃片，非常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不像经过火烧的样子，阳光下，依然透明、坚实，难以想象45年前它们炸裂开来，随后就静静地在异国土地上守候着，经历了45个寒来暑往……我的视线渐渐模糊了。

大家帮着我前把前人留下的垃圾收到石碑后面去，我把带来的花束平放在碑前，在花前摆好带来的一次性杯子，把酒均匀地倒进九个杯子里，还给自己倒了半杯，我先站立着向石碑行礼三鞠躬，我把杯子高举过头以示敬天，再俯身洒向草原以示敬地，最后和九只杯子一一碰杯，喝了一大口杯中的酒，我又将九只杯子里的酒一一洒在了石碑的周围，嘴里

念叨着他们的名字……。高温下，汗水、泪水和酒混合在一起，心里升腾起一股巨大的悲凉！我敬立在石碑前，开始按照自己想好的仪式给他们唱歌，我先唱起了《八路军军歌》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一开口就已带哭音了的我，脑海里像电影一样闪过了无数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战斗画面；接下来我又唱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的声音嘶哑了；最后我调整了一下情绪，用更大的声音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就是长眠于此的他们听一听“乡音”，听听这些在他们生前再熟悉不过的旋律！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亲人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

烈日下，蒙古朋友静静地肃立在一旁陪伴着我。当我含着泪把最后一句“前进进”唱完，缓缓地转向他们，窝吉对翻译说了一堆话，并且用手指了指盆地的西面。在西面，我的目光被起伏的山坡挡住了，除了和周围景色一样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任何异样，但我立刻意识到窝吉指的是埋葬地点。根据孙一先书中的描述，那是“按照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¹ 翻译告诉我：窝吉说了，人都埋在西边的山上那边。坟墓上面原来放了个很大的飞机残骸，后来也被人拿走了，现在什么都没了。甚至连坟墓里面还有没有遗体也不是很清楚。



我说：去看看，找石头堆起来的地方！

等我们越过孙一先书中描述的那道沟来到西边的山坡（坟墓石堆边以前祭奠的遗留物）下仰头搜寻时，真是有点茫然了，因为这横亘在我们面前缓缓而升的山坡上并没有想象的一个石头堆起来的坟墓，反倒是目及的一二三百米范围内散落着几个零星的石头堆，我们无从分辨，只好逐个去察看，结果爬到那一看，发现都是自然裸露在那里，不像人为堆砌的。

¹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95-196页

挨个儿找了几个以后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了，望着不远处还没察看的石头堆，不知道先看哪个好了。还是乌吉聪明，他跑回车上，开车往南边剩下的石堆边上绕着，像一匹马遒劲地在斜坡上奔跑，终于他停下来，指着一堆石头兴奋地冲我们挥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一齐向他指的那堆石头奔过去。

果然，这明显不同于其它的石头堆，是一堆人工堆起来的差不多大小的石头，在它下面有一座略隆起的土坡，距离山坡脚下两三米的距离，石头堆虽然不高但堆的方式像蒙古的敖包，呈金字塔型；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石堆旁边有好几块茅台酒瓶的白色瓷片和别的什么酒的绿色酒瓶碎片，不过，相比而言，显然是石碑那边祭奠遗留下来的用品数量更多，更多样。

找到了！我们激动地相视一笑！



我站在坟墓边上向石碑方向看过去，只见茫茫草原像一片绿海，根本看不见那块石碑。我让乌苏合按照事先说好的回石碑那里把花束拿过来，目送着他的车往盆地中央开，最初是直线向东，后来见他又往北，最后停住了。我目测乌苏合在草原上压出来的浅浅的车轮印迹，感觉一下 1100 米的距离，想象着在 45 年前盆地中央一片狼藉，月黑风高里蒙古的士兵们吃力地挖着大坑……

乌吉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用手势比划着建议（从坟墓眺望苏布拉噶盆地）我再往石头堆上垒多些石头。我理解是他们的风俗，就像给坟上培土的意思一样。在他的带领下，我费力地收集着四周的石头往石头堆上放，每块石头都很尖利，硌得手生疼，还被太阳晒得滚烫滚烫的，乌吉大捧大捧地拣，我一只手只能拿一块，只好靠多跑才能多拿，就这样咬着牙来回小跑着，汗如雨下！等乌苏合回来，我和乌吉已经把石头堆垒得扩大了不少。

我把花束摆放在垒起的石头堆上，下半截用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刮走。敬完酒，乌吉示意我绕坟墓三圈，就像绕敖包一样，这也是蒙古国的习俗。我拿着打开的酒瓶边绕边倒着酒，说着我想告诉长眠于此的人们的话——

祖国变化很大，我们现在都挺好的。

刘沛丰叔叔，张平阿姨前几年去世了，你们见面了吗？

潘景寅伯伯、李平、邵起良、张延奎叔叔，家里人都安好，你们放心吧……

老杨叔叔，军玲都当姥姥了……

林副主席、叶主任，你们安息吧！

吕果叔叔（林立果参军到空军就改名叫“吕果”，我父亲要求我们像对其他长辈一样叫吕果为叔叔；没有记错的话256飞机失事现场他的那张空军大院出入证上也应该是“吕果”），我爸爸和于新野叔叔想追随你们，但是没成，他们当天也在怀柔就义了。我今天来告诉你一声。

……

我把事先在酒店写好的三张纸烧了。第一张是代表我自己写的——

致敬爱的林彪元帅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向红 敬上 2016.8.2

“九一三”时我尚不足十七，如今已六十有二，白发丛生，自是百感交集！“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终局已昭昭可见，无路可逃，人的一生成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惟有“照汗青”的一颗丹心天地可鉴！林彪元帅给世人留下的，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建国史中的赫赫战功与耿耿忠心，林立果则遗留给世人一篇当头棒喝与深深思索的檄文——

《“571”工程纪要》。

我肃立在墓前，想起前不久，亲耳听到一个比我大的姐姐说，当年我父亲推荐给她读的书目：尼采、叔本华、笛卡尔、苏格拉底，读完了还要让她谈读后感、心得……令我为之振奋，原来父亲还读了这么多的西方哲学著作！我只知道他办公室里有个小图书馆，却不知道架子上有什么书。一个军人、党员，又在文革期间，他为什么读这些书呢？读了是怎么想的？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格言如雷贯耳！是多少奋力冲破藩篱的志士仁人的明灯和号角？《君主论》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视野和视角？历史还有很多谜底没有揭开，也许永远无从知晓，但在浩瀚的长河之中一定会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指引着我们去寻找真理和幸福，人类的这种寻找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牺牲，但却从未停止。

我从思绪中醒来，接着念第二张纸，这是受张清林之托，写的是：

爸爸、妈妈、弟弟千古！

我们怀念你们！！！！

豆豆、清林泣拜（向红代笔 2016.8.2）

来蒙古前跟老张说了，他只说了句“如果你去‘那里’，替我们念叨念叨。”我自然明白，答应了。

记得2011年我在网上看到了老张在温都尔汗坟前读的悼词，曾经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提“弟弟”呀？难道立果不是你们的亲人？！他向我解释了苦衷。今天，我理所当然地加上了“弟弟”两个字，这才是当年那个完整的家、包括了家里所有的人！无论“九一三”事件多么地被政治妖魔化了，今天这薄薄的一张纸，托付的应该只是无尽的思念和盼望亲人遗骸回归的骨肉之情。我没有在称谓前面加什么修饰词，用三个感叹号足矣。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寄托哀思的使者，所以简单直白就好。

第三张是向所有“九一三”遇难者致意，我选择了一首清代徐锡麟的诗《出塞》——

军歌应唱大刀环，
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

——缅怀、悼念“九一三”逝去的先辈们！

向红，2016.8.2

这首诗先是带我走进了一个军旗猎猎、三军待发、硝烟弥漫、战马嘶鸣的意境，又与“九一三”坠机的惨烈现场混成了一曲低沉的蒙古呼麦，我泪水低垂，笔在手中颤抖着，以至于当时我竟不能一挥而就。尤其是最后一句，汉家将士战死于边野，何必考虑是否能以马革裹尸还葬故土？那散发着历史长河中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就义的决绝气势是何等壮怀激烈，又何等淡定！一张张又熟悉也陌生的面孔在脑海里闪过，抹去所有的观点，不管历史怎样定论，45年来就这样被抛弃在异国他乡，亲人们望穿秋水，望断45个春夏秋冬……而事实却依然令死者的家人继续绝望，令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继续失望！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据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书对此是这样记载的：“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第二天，9月15日，天傍亮的时候，使馆收到国内关于死难者尸体处理的指示电，内称：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确有困难，可以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¹

无疑，驻蒙使馆收到的“指示电”是经毛泽东、周恩来获知256飞机坠毁后签发的，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就地”掩埋在当时中蒙两国看来都是临时之举，“深埋”则是技术活，并不决定埋葬时间的长短，而“以便今后将骨骸运回国内”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我驻蒙使馆的确在9月23日根据国内指示正式向蒙方提出运回尸体和交还死者遗物的要求，由于没有把蒙方想要的“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提供给他们，所以遭到了蒙方的拒绝，

¹孙一先：《在大漠那边》，173页

这在余汝信先生整理的蒙古国 1971 年 11 月 20 日 “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中表露无遗——“就中国军用飞机未经批准而侵入我国领土一事”，“如果中方向我方索取死亡人士的尸体、个人物品或照片，不予应允，直到尸检完成和尸体火化之后再做处理”，“如果中方希望取回坠机地点发现的文件，不予应允”。¹尽管三天后的 9 月 18 日中央在下发[1971]57 号文件里已将林彪称之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肯告诉蒙古国真相，致使外交谈判破裂。

如今，坠毁的 256 飞机上的人员是谁已是世人皆知，45 年前而未能善后的一切，我国的声索既然从未声明放弃就应该视为有效，虽然不说实话直接导致了蒙方气呼呼的“不予应允”，但 45 年来蒙方确实遵守了“在有关结论尚未形成之前，飞机残骸由肯特省的 ADHG 当局妥善保管”的自行决定，并没有再去惊扰死者；所以可以推断，蒙古方面应该不会再为此设置障碍。换个角度说，“将骨骸运回国内”应该视为是当年一代领导人的一个政治遗愿，对于今天的中蒙关系来说并不应该是一件难事。其实蒙方一直没有关上要对坠机事件（我祭奠的现场）做个结论的大门，中国只要对蒙方有足够的尊重和诚意，完全可以



正式向蒙方承认事实、告知真相，取得对方的谅解，打破僵局、重启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让这九具遗骸重新回到祖国，交还给他们的亲人。这一行为，完全可以绕开“九一三”事件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敏感性，充分体现中国在外交问题上的灵活性和对历史问题敢于担当的大国实力，以及对人性的回归。

三页纸终于都念完了，深深的三鞠躬之后，我打着了不知谁递过来的打火机，跳跃的火苗点燃了第一张信纸，我一张接一张地续上去，一切都很顺利，我松了一口气，相信地下有知已经收到了这些信息。

¹余汝信收集整理：《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e2c94500102wxpo.html

我站起身，擦干眼泪，再次回首深深凝望了这片辽阔的草地，内心和它作别。这一天是2016年8月3日，是建军89周年节后的第三天，距离“九一三”事件发生45周年还差41天。

就在前几天，我弟弟忽然在微信群里说“昨晚做梦梦见爸爸了！”大家纷纷询问，我也问“你梦见爸爸干什么呢？”

他说忘了，只记得在梦里爸爸挺高兴的。我心中微微一颤：是不是吕果收到我转告的信息，他们又相见了？

紧接着弟弟又上传了两张我们小时候的照片，一张我们兄妹三人，一张我们三人和父母的合影。在夏日里的松花江畔，阳光下的我晒得皱着眉头，还都上幼儿园的兄妹三人并排站在年轻的父母前面，我恰好站在父亲一边，父亲垂下的左手正好放在我的左肩，望着照片，仿佛仍然能感受到那只手的温度。

这次探访，发现了几点疑惑之处：

第一点，2011年张清林等人来现场祭奠时的黑色石碑不见了，那个石碑是2008年9月13日立立的，现在的白色石碑是2013年立的。乌吉跟他的朋友们打听，说是“原来的石碑被牛踢坏了。”我听了觉得这个回答太搞笑了，不太相信。结果无意中潘景寅的儿子潘鹏告诉我，继2011年9月后半年左右，《凤凰卫视》组织了一些人来温都尔汗做节目，他姐姐也参加了，当时那块黑色的石碑就没有了，（汽车仪表盘上记录的石碑的经纬度）他说节目组听说是牧民嫌它绊牲畜的腿，给挖走扔了。所以当时《凤凰卫视》的人找了好久找不到墓地，最后天都快黑了才找到。



这块白色的石碑从外观的大小、形状、落款都很相似，唯独字体不同，同时碑后的“历史不会忘记”增刻了蒙文。

原来黑色石碑正面上刻的是“九一三遇难者之墓”，现在则刻的是“九一三遇难者之

处”。显然，到了2013年的9月13日，立碑者已经明白盆地中央是256飞机失事的地方，墓地在别处。也不知道两次立碑者是不是同一个人。

第二点，根据孙一先书中对现场的描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南北长三千多米，东西宽约八百米。”¹假设失事地点在盆地中央，离东西山坡各距不足四百米，如果要从失事地点向西1100米外选择墓地，哪来的这么远距离呢？这么矮小的山包，是不是就要葬在山顶或翻过山坡葬到西坡去了呢？

第三点，根据孙一先书中“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256飞机“在东经111°15′、北纬47°42′”处失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称：埋葬地点“距失事地点西1.1公里的无名高地的东坡，东经111°17′40″、北纬47°41′20″”。²此外，《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中也表述了相同的失事地点。³

可是根据我们的测量，现场的石碑位于东经111°11′36″、北纬47°38′54″处；经过经纬度与距离的换算，石碑与失事地点相距6.2492公里。那么问题来了：按照孙一先书中手绘的现场图⁴和蒙古“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中的描述，既然坠机现场的“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600×100平方米范围”内，怎么会在距离失事地点6公里远的立碑处的地面上遍布飞机细小的碎片？谁立志非要把石碑立在距离失事地点这么远的经纬度上？难道石碑处地表上的飞机碎片是被牲畜们的蹄子经年累月从失事地点踢到现在这个经纬的？

第四点，按照蒙方公布的失事地点与埋葬地点的经纬度换算，二者之间应当相距3.5527公里，而不是1100米的1.1公里。

第五点，众所周知关于经纬度的正确说法是：以零经线为界，东经和西经的度数分别

¹孙一先：《在大漠那边》，187页

²孙一先：《在大漠那边》，216，218页

³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e2c94500102wxpo.html

⁴孙一先：《在大漠那边》，206页

向东、向西越来越大。具体说来，蒙古国都在东经范围，应该是越向东数值越大，比如乌兰巴托是东经 $106^{\circ} 55'$ ，肯特省在乌兰巴托之东，东经数值就比首都大，到了距离肯特省省会 70 公里外的苏布拉噶盆地，东经已经是 111° 了。按说埋葬地点在失事地点的西面，东经数值应该比失事地点的东经 $111^{\circ} 15'$ 小，怎么反而是东经 $111^{\circ} 17'$ 呢？应该反过来，失事地点的东经数值大，埋葬地点的东经数值小，就对了。因为是第一次计算经纬度，也可能算错了，希望有人进一步验证为准。

窝吉父母放牧的地点距离苏布拉噶盆地只有十几公里，因此窝吉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车子停在了蒙古包门口，乌吉和乌苏合像变魔术一样从后备箱里拿出几个购物袋，我才意识原来他们早有准备。孩子们都领到了他们带来的水果糖和雪碧汽水，个个喜形于色，拿在手里一副舍不得马上吃的样子，我看了很感慨。蒙古的水果糖很简单，像我们国家六十年代的质量，花花绿绿的纸包着，好一点的是玻璃纸包着。此时的雪碧也早成了热的，最小的那个孩子也就两岁左右，热的全身一丝不挂，抱着雪碧不知道怎么能喝到嘴，一个劲儿去啃咬瓶盖，大人也不去管他，一直到我们离开，他也没喝到，但仍是心满意足地在们面前晃来晃去，冲着客人乐，临走和我说了好几遍“拜拜”，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肥美的手抓羊肉，喝着微凉的奶茶和自制酸奶，聊天中我得知窝吉的父亲一直在这附近放牧，今年整 60 岁。我问起 45 年前的 9 月 13 日那个夜晚他在哪里，他说在“离飞机掉下来的地方 10 里的地方”，“当时在睡觉”，因为还小，“没敢去着火的地方看”；我问他有没有听说飞机是在空中着火了然后掉下来的？他望着我憨憨地笑着回答：不知道。

晚上夜宿在成吉思汗浩特市内的宾馆，白天炎热的气温凉快下来了，晚饭后我们想出去散散步，跟乌苏合说了，谁知本来要休息的乌吉他俩也要陪我们一起去，我们碍于面子勉强同意了。在他们俩的陪同下我们去了相当于文化公园和中心广场的地方，公园很简陋，倒是有几座肯特省历届那达慕摔跤、射箭、马术冠军的塑像，很直观地反映了这个尚武国家的传统，肯特省是成吉思汗的故乡，也是乌吉的家乡，他很骄傲地让乌苏合把这几座塑像翻译给我们听。中心广场的两边各有两座塑像，一座是成吉思汗母亲领着小时候的他，

一座是成为可汗的他，乌吉主动建议让我和塑像合影，我依言拍了，乌吉笑得很开心。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问他们：白天路上乌吉摇头晃脑唱的那首歌的歌词是什么呀？乌苏合把我的话翻译给乌吉听，乌吉笑得更开心了，他伸出两只手比划，面露得意之色。乌苏合也笑了，他笑伙伴的样子。原来，歌名就叫《小手》，歌词是一个女人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赞美自己的小手，多么小，多么白嫩，多么巧……。哇！我不由地为蒙古这种直接表达的淳朴意境大为倾倒！怪不得乌吉唱时表情怪怪的，原来是在模仿女性。我在国内没有听过类似的蒙古族小调，听到的都是高远而悠长的歌唱祖国、山川、家乡的歌曲。这些歌当然要有，但像《小手》这样带有浓郁民间养分的歌曲也不可或缺。乌苏和反问我：那你们的歌里都唱什么呢？我给他唱了两句《鸿雁》，告诉他们一般是怎么“大气”怎么来，节奏感和内容比较传统，悠悠的，带点忧伤，适合吟唱乡愁……。不知道他们听懂了没有，但显然这个话题令大家的感觉更亲近了一些。

半路上，乌苏合跟我们说：因为你们是外国人，怕你们出事，所以要陪你们一起来。这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刚才的不解打消了，心里感谢这两个外表粗犷却细心的蒙古汉子。

我故意跟乌苏合开玩笑：难道我们穿得这么普通还不像你们国家的人吗？他很认真地解释说：“光看衣服你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说话就知道了！这里的人喝了酒……”大概意思是这里的人不像首府乌兰巴托，“比较野”。我听了以后真诚地向他们致谢。

公园和广场十分钟就转完了，乌吉又建议我们去河边看看，原来离我们下榻的宾馆很近就是著名的克鲁伦河。由于是夏季汛期，河面宽阔起来，太阳刚刚落山，玫瑰紫色的余晖映得河面分外美丽，晚风习习，我们站在河岸边，看着河里嬉水的人们，安宁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桥上的灯光像两串钻石项链，长长地倒映在水里。

我们都沉醉在美景中没有说话，我完全感觉不到这是在外国，白天的酷热和悲痛已然褪去，生活展现出真实而美好的一面。一转身，发现乌吉抓拍了几张我沉思的侧影，朦胧的暮色中，我和这妙曼的景色融合在了一起。我望着他们的笑脸在心里由衷地说：谢谢你们，蒙古的朋友们！■

【林彪研究】

林彪与七千人大会 ——兼论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高层政治互动与博弈

越人

前言 相关研究的回顾

七千人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之地位。关于此次会议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有了不少，在此简述其大端。

高华先生的《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一文尽管成文较早，但作者运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史料，对于毛等领导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心态及种种举动有颇为深入且犀利之分析。但作者文中所划分的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一类和对大量百姓“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的另一类之区分¹，在史料日益增多的今天，却有简单化之嫌，当然造成高文此一问题的原因更多源于当时史料获得之不易，而今日之学者在这一方面当有更好的解析。

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是关于七千人大会研究的专题著作，作者运用大量重要的一手史料，对七千人大会的相关史事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与分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作者在分析评价相关的某些历史人物时，仍或多或少存在“判断先行”的问题。

钱庠理的著作《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详细叙述分析了从1962年到1965年的共和国史事，该书的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及其围绕大会所产生的分歧”即为对七千人大会这一历史事件的专题分析研究，

¹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第64页。

该章参考引用了张素华书的很多内容，但在分析探讨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关于毛心态的分析，和高文更多着眼于权术方面的考量，钱著则对于毛的革命理想一面有更多的阐发。对于毛在这一时期“纠左”中发挥的正面作用，也较高文有更多的肯定。对于七千人大会上毛和中共中央领导层之间的分歧矛盾，作者也不太认同此前主流学界的解说，认为“这种将历史截然分为‘正确’和‘错误’的解读方式，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私下的不同看法可能存在，但并没有出现截然对立的思想分野。要知道，采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意图，是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共识。始作俑者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其他人，包括刘、邓……‘大跃进’出现挫折，并不一定立刻就形成人们认识的对立和出现一批要用‘正确’方法来‘清算’和‘改正’它的党内‘反对者’”¹。作者的这种思路，应该说是传统的“黑白分明”的历史叙述分析方式的一种反思和否定。而依循这种思路，作者对七千人大会期间一些历史史实的解读也较以往研究更为深入了一步。比如在分析彭真那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发表的提及毛错误的讲话时，作者就没有简单接受以往那种褒扬彭真“直言”的思路，而是在认真探讨分析之后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彭真的发言，与其说是针对毛泽东，还不如说是通过坦率的直陈来维护毛泽东”²。

对于高层领导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的表现，迄今为止已有很多相关论著涉及，尤其是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扎实深入的成果。钟延麟在其著作《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相较于林彪在‘七千人大会’公开讲话中力挺毛泽东，邓小平支持毛的坚定立场，实也不遑多让³”。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合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以下简称《新周》）一书在论述七千人大会相关史事时，对于周恩来、刘少奇等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有较为深入之叙述，该书所作的

¹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7页。

²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第92页。关于彭真讲话性质的探讨分析，本文也会根据更多的史料展开讨论，此处不赘。

³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相关分析判断也有不少与以往研究相异之处¹。近来亦有研究者利用新出版的《彭真传》、《彭真年谱》等史料对于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表现有更深入之分析论述²。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一直受到史学家的关注，长期以来关于这一发言的研究分析多以负面为主，而且带有很强的预置判断成分。于南在《林彪集团兴亡初探》一文中对于林的发言有这样的评述：“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言，他别有用心地说这几年的错误和困难，不是毛主席的错误，恰恰是由于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泽东十分赞赏林彪这个为‘大跃进’错误进行辩护的发言，对林彪的信任也进一步增强了。可以说，林彪几年来大搞个人崇拜的结果，确实骗取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全党、全军中也留下了林彪是‘高举红旗’‘好学生’的印象。林彪的影响和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就是林彪篡党夺权的第一个基本策略手段³。”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对于林彪发言的性质也多有负面评价，认为林彪“已蜕变为不讲原则而工于心计之人”，“这一时期的林彪，对如何迎合毛泽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林彪也学习理论，也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但他钻研的，是‘登龙术’，是如何成为‘当代伟大人物’，并且大有收获”。由此论断出发，作者将林发表讲话的动机定性为迎合毛泽东，认为林的讲话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林“影射攻击了认为毛泽东也有责任的人，攻击了那些没有为毛泽东积极辩护的人”。但作者对于当时参会的大部分人认可赞扬林的讲话这一事实却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而是以“不明情况”，看不出林彪的“别有用心”而一笔带过⁴。

钱庠理著作中对林讲话所做的分析探讨则与以上两位存在明显的差异，钱书指出，“林

¹如《新周》作者根据史料认为刘当时的讲话在收入刘少奇选集时被作了较多的删改，而如果结合被删除的内容，刘讲话中“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做出结论”这一论断“恰恰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维护三面红旗”。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17页。

²就笔者所见，已经有两篇文章利用到《彭真传》第三卷的相关资料，赖不一：《读〈彭真传〉第三卷》，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5a656b0101b70b.html。周言：《〈彭真传〉、〈彭真年谱〉中的历史秘辛》，《凤凰周刊》20013年第12期。

³于南：《林彪集团兴亡初探》，谭宗级、郑谦等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⁴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7页。

彪讲话是否得到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支持，是否得到与会人员的正面评价，或者，林的意见是否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相当一些人的看法，是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据”。在关于林彪讲话内容、性质的分析认定上，钱书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尤其是不认同此前学界对林彪讲话所做的一些批判性结论，正如该书就关于林彪发言是迎合、讨好毛泽东这一论断所做评述中所言：“在既定制度和政治生态下，讨好毛泽东并进而有所图，不是件不正常的事情，在共产党内，谁存心想同毛泽东分道扬镳呢？即使彭德怀也绝非这样想。拥护毛泽东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论毛泽东做什么，都毫无疑义地、死心塌地地拥护。这一类人如同宗教崇拜，对是非没有兴趣。还有一类，是看到问题存在但碍于种种考量，不但没有提出意见反而褒以拥护言辞。后一类人构成比较复杂，但并不一定是坏人。历史不能逆推。一个人后来出了事，其前面的历史不能被推为同恶。对林彪评价也应如此。”钱书在该章节的后继论述中还特别强调“道德批判不能代替历史解释”，“历史阐释也不能为人物的政治结局负责”¹。

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以下简称《找寻》）一书是一部详细叙述分析建国后林彪史事的著作。该书第五章“1962年七千人大会与林彪”详细叙述了七千人大会的相关史实，尤其是对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等政治局常委在此次大会上的所做报告、发言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刘少奇的口头讲话中包含了大量维护、肯定“三面红旗”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的发言内容“除了自我批评外，都对责任也大包大揽，为毛辩护”。而林彪讲话中对自然灾害的叙述是党内当时“众口一词”的“共识”，“付学费”一说也不是林的发明创造，而是此前党内不少高级干部乃至毛泽东早已提出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找寻》一书做出这样的论断，“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当然不能说是正确的，为毛泽东的辩护更是牵强和苍白，但是由此而认定林彪是怀着个人野心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也不是客观的公允的。我们毋宁将其看成林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了

¹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5页。

他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的角色，因而更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和局限性”¹。司马清扬在其2012年出版的专著《周恩来与林彪》中更运用不少重要史料对于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共高层的复杂博弈进行了分析探讨²，从而进一步开拓了相关的研究视野。

王海光的《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一文是国内学者较为深入仔细探讨七千人大会上微妙政治博弈的优秀论文，该文较好地叙述和分析了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及其他中央和地方高层一些政治行为背后的复杂互动与博弈，作者在分析林的讲话动机时，没有简单地进行道德批判，认为林之所为除了“投其所好的政治功利目的，也反映了党内一种护短的狭隘心理：即维护毛泽东威信就是维护党的团结，担心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过多会造成党心民心的涣散。这种观点，在党内是有些基础的”。在分析评价林彪讲话对毛泽东曲意维护这一问题上，王文也指出“曲意为毛泽东解脱责任的，不仅仅是林彪，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意识”³。

经过既往学者们发掘梳理史料和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的种种努力，我们对于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和相关历史人物的种种表现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围绕此一历史事件，仍有值得继续研讨之处。中共高层诸人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革命理想情怀相关，但各种复杂微妙的责任认定问题、个人分歧、恩怨乃至山头矛盾与冲突等等，同样影响着他们在七千人大会前后，面临大跃进失败灾难时所可能做出的应对。而以往的研究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受到既定研究框架局限、史料不足等方面的限制，总体上存在一定的不足。这既影响了我们对此历史事件的深入了解与探讨，在认知和判断七千人大会产生的复杂影响方面亦有所偏颇。笔者此文，试图从现有史料入手，尽可能客观地考察林彪等中共高层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复杂表现，进而对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高层复杂互动、博弈做出一定的分析研判，希望能对于此事件的相关研究能有所裨益。

¹丁凯文、司马清扬著：《找寻真实的林彪》，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54页。

²司马在书中指出60年代前期周恩来和林彪都一度面临政治上的困境，如彭真等人在59、62年两次追究高岗与彭德怀、林彪、陈云的关系，以及高岗的里通外国问题，而彭真在62年几次找姚依林谈话，查询财经部门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问题上不点名的责难周。司马清扬著：《周恩来与林彪》上册，明镜出版社2012，第145-151、158-162页。

³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34、39页。

一. “大跃进”浪潮中的高层表现：以常委和彭真为中心

邓小平对于大跃进浪潮中的高层表现有一句很坦率的评语，“‘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¹。应该说，积极响应、追随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党内高层的普遍状态。本部分将主要考察当时的各位政治局常委和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彭真²在大跃进中的相关表现，进而为分析探讨这一政治人群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政治行为打下基础³。

作为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积极表现也是较为突出的。如其在 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的发言中，就认为“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的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认为‘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现在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⁴。在大跃进浪潮中，“刘少奇热得更多一些，他视察过许多地方，对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大加赞赏和提倡，混淆了指导革命战争的规律与指导经济建设的规律的不同，幻想能象解放战争中打了三大战役取得革命决定性胜利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也能连续打几个大的战役，苦战三五年，一鼓作气拿下‘决定性的胜利’。他对于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搞供给制，快一些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

¹邓小平：《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6 页。

²彭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56 年 10 月 5 日举行的八届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书记处成员分工时，明确彭真是“协助邓小平负总责”，邓还在一次会议上提到，“彭实际上是党的副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而毛于 58 年决定设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中央小组，并明确划定中央领导机构职责，“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也随之一步扩大，而作为“副书记”的彭真之权力自然远在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之上。《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9 页；《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26 页。毛泽东：《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8 页。

³在笔者看来，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危机，理想情怀、道德情操固然会驱使政治人物做出被人称道的举动和选择，而趋利避害的政治生存考量依然是无法排除在外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探讨“大跃进”浪潮中的高层表现，对于理解和认知他们之后的政治反应和行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0 页。

过渡，同样表现了过分的热心。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就是根据他的指示办起来的”¹。而提出在河南搞公社设点，也是源于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位在火车上的一段“吹牛”²。之后刘更是为“公社”大力鼓吹，1958年6月30日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就主张“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³。10月会见某国代表团时，针对团长“学校也要搞公社的疑问”，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⁴。而在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继续跃进”期间，刘也依然表现得十分积极，在59年8月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时，刘就大力为三面红旗辩护，讲“去年的大跃进是大跃进，不是假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人民公社是办得对的。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部分缺点、错误已经纠正了。大炼钢铁不是得不偿失，而是得的很多，失的少。”并认为“大跃进”中犯错误是合理的，是取得了经验⁵。总的来看，刘对于“大跃进”的看法直到61年春才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危害，刘在61年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对于之前提出的“公共食堂不能散”、“一个指头九个指头论”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但基于各方面的复杂考量，刘在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依然认为“这样一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的本身，而是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有严重的缺点错误”⁶。

¹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732页。当然也应指出，刘等人的“吹牛”，应该与毛泽东在此前广州会议上向四人所作“吹风”有关。

³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6年6月30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12.htm>。

⁴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0月8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18.htm>。

⁵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8月24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19.htm>。

⁶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28.htm>。另可参见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被毛在“大跃进”期间赠与“副帅”¹称号的邓小平，尽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在最后一位。其实际地位却在多位常委之上。尤其在58年反“反冒进”开始之后，周恩来、陈云等此前掌控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严厉批判，而毛也乘此机会改组中央领导架构。早在58年2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就传达了毛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邓在这次会议上也明确表示：“书记处工作范围扩大了，要有新的工作方式。把握两条，一是为政治局挡一些日常工作，二是不越权”。一周后的2月25日，邓即主持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会议，研究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关系问题，以落实毛此前要书记处管国务院工作的指示²。而此前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在就“反冒进”所做的第一次检讨中，也就如何解决财经部门“封锁中央”³问题陈述了五条办法，其中的第二条办法提出“政府的财经部门有一个人能够参加到书记处经常反映问题，许多文件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帮政治局滤一道，书记处抓政府的工作”⁴。随着6月份中央成立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中央小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取代了国务院成为新的“政治设计院”核心部分之一⁵。而荣膺“副帅”重任的邓小平自然尽心尽力，领导中央书记处在“大跃进”中发挥着重要的参与决策与监督执行之责任。无论是“大跃进”初期积极批判“反冒进”⁶，要求高级干部积极跟随毛泽东⁷，还是之后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各

¹1959年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在该讲话中毛对于挂帅问题有这样的表述：“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元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两人一正一副。”“我和邓小平挂帅。邓小平你挂了没有？你敢不敢？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466页。另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6、1418页。

³毛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判反冒进时，就指责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报”，“实际是封锁”。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二）》，《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整理版），第6、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页。

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6页。

⁵如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中央副主席陈云虽在此次调整中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其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必须听命于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24页。

⁶邓在成都会议上就“反冒进”问题作过批判发言，其发言称“‘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还认为“反冒进”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其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错误绝不应轻视，要正视它的顽固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页。《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陶铸传达记录）》，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编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反动言论》，转引自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项决策，鼓舞各地“大跃进”的干劲，以及59年庐山会议后参与“反右倾”运动和参与制定1960年的继续跃进计划，邓都表现积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¹。

在毛发起的反“反冒进”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被批评打击的重要对象。在58年初相继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周恩来首当其冲，成为毛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毛后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他在杭州会议上放火，“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指柯庆施——编者注），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²，南宁会议上毛更指责周搞“‘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要周读《登徒子好色赋》，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³。

受到毛严厉批判的周随后便作了深刻的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相继发言检讨之后，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一次作了深刻的检讨认错。在该检讨发言中周将自己犯“反冒进”错误的原因定性为“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对毛倡导的反“反冒进”大加肯定，认为“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并赞颂毛“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⁴。

在进行深刻检讨的同时，周积极投身到毛发动的“大跃进”浪潮中，其领导的国务院忠实执行了毛为主帅的“单一政治设计院”的各项指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周恩来在59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中发表了《伟大的十年》一文，尽管此时的周对于大跃进

年版，第219-220页。

¹邓在当时的一次中央会议中强调要积极地跟随毛泽东：“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赶不上主席的思想。与主席思想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今后还会存在这种距离。得到了教训。再没有（距离）了？今后还有”。“我完全赞成，自己应相信毛主席比我们高明的多。要跟上去，可以跟上。高级干部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这是真正可靠的跟上”。《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编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反动言论》，转引自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²邓在“大跃进”期间的诸多作为，钟延麟著作《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可参看。

³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5页。

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整理版），第9页。

⁵《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5页。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17页。

造成的种种问题已有相当的了解，但仍然“违心”地在该文中为“大跃进”等“三面红旗”大唱赞歌，并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的积累达到一百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多。全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左右。这一切事实，说明人民公社的巨大的优越性是无可怀疑的，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们的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工作中的个别的、暂时的缺点，不加分析，而且任意夸大，来达到否认大跃进、反对总路线的目的。对于他们的这一切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和污蔑群众的论调，事实是最好的反驳”¹。

彭真“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发动‘大跃进’的主张，是由衷拥护、努力贯彻的。他认为‘大跃进’就是‘想搞出我国自己的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他的态度是：‘永远做促进派’”²。作为“副书记”和北京市的一把手，彭真在北京乃至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开展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如北京在1958年8月17日于天坛公园举行了农业跃进誓师大会，彭真亲临大会并发表讲话，其在讲话中提出“要使农业大跃进，必须继续破除迷信，破除对老经验的迷信，对书本子的迷信，对农学家的迷信，对农业‘操作规程’的迷信。过去世界上有谁有过亩产七千多斤小麦，亩产三万几千斤稻谷的经验？”彭真讲话后下面的区（县）委书记纷纷放出粮食高产卫星，甚至有提出小麦试验田要达到“亩产一万斤到十万斤”的³。同时，作为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彭真在具体部署组织“大跃进”上也是尽心尽力。如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全民大办钢铁”之后，“从九月开始，抓钢产几乎成为中央书记处最主要的工作，也就成为彭真最主要的工作。在九月二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第八十五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在他外出时，中央书记处

¹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人民日报》1959年10月6日第2版。

²《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57页。

³1958年8月18日《北京日报》，转引自《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三卷，中央文献2012，第971-972页。

工作由彭真负责……最让彭真操心费力的还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任务”¹。

朱德和陈云虽然都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大跃进期间多处于“投置闲散”的政治状态。朱德和毛泽东从井冈山时代起就是关系密切的战友，但是早年的“朱毛之争”²，朱德在此前发生的“高饶事件”中的某些表现³，都让毛对朱德抱有相当复杂的看法⁴，朱德当时虽然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在毛泽东于58年做的中央领导架构调整中，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乃至国务院都有一席之地，但人大却和它的委员长一样，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陈云也是反“反冒进”批评的重点对象之一，其领导的财经部门受到毛的点名批评，陈云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等多次会议上一再检讨自己参与“反冒进”、“财经部门封锁中央”等等错误，其此前领导财经工作的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剥夺。陈云虽在1958年中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有‘反冒进’的‘政治错误’在身，所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内并不积极管事，而主要由李富春、谭震林与薄一波掌管，他们再向邓小平报告、请示”⁵。而且这一小组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不同，它已经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这样一个小组，后来活动日益减少，乃至无形中不再发挥作用”⁶。

而这种政治闲人的处境，倒是让朱德、陈云对于“大跃进”运动的癫狂有更冷静的认识，如朱德在大跃进期间对于公共食堂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批评⁷，而陈云尽管因“反冒

¹《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76页。另可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页。

²在红军时期，朱、毛在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分配、党军关系等问题上发生矛盾分歧，朱、毛之间的微妙博弈从红四军七大前后开始，到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有了结果，毛成为此次斗争的获胜一方。

³朱德因为在1953年12月15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赞成毛泽东外出期间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中央工作。后来被林彪指责为“主张轮流，想当主席”，周恩来更批评朱德“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1966.05.2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彭时这样评价朱德：“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另据李锐转述田家英的说法，称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同秘书林克谈话时称朱德是老右派，而王力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曾对朱德有这样的评价：“红军长征中处在危急的时候，每次政治局会议永远是四票对三票，这四票一是博古，二是李德，三是朱德，四是周恩来”，“朱德每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不是站在对立的方面，就是不大清楚”。王力回忆毛还讲过：“我这一辈子一定要保两个人，一是朱德，一是陈毅”。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169页。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714页。

⁵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

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5页。

⁷朱德在59年对农村办公食堂多次发表批评意见，大饥荒全面发生后，朱德在1961年5月致信毛泽东，坦陈陕西、河

进”受到严厉批评，其在大跃进期间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其“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思路，经历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之后，陈云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成为了高速发展的促进派，主张“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发展速度最快最有希望的地方”，“用群众运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增产”，但他同时仍强调计划、比例的重要性，认为“各省提出的指标数字，我以为需要再充分研究一下它的可靠性”，“计划应该照顾到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前进，但是可以在先后次序上有所偏重”，对于58年下半年做出的该年钢产量翻一番的决策，陈云也相当不以为然，还因此而批评冶金部长王鹤寿“怎么这么轻率”¹。在“大跃进”一片狂热的气氛中，陈云在58年底、59年初对于59年的高指标尤其是钢产量指标是否能实现提出了质疑意见，并最终获得毛的采纳²。

总的来说，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刘、邓、周等常委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位列其下的政治局委员、中央部门领导乃至各地的封疆大吏，也大都概莫能外，在这场“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出色。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正是在大家集体“发烧”的背景下，这场狂潮越走越远，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二、“大跃进”期间的林彪：有些无奈的两面人

大跃进期间林彪的党内、军内地位有较大之上升，58年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59年庐山会议，林彪在会议中段上山，作为毛搬上山的“救兵”，林积极响应毛对彭的批判，站在毛的路线上，通过了毛的考验，从而得以在彭被打倒后继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在59年国庆发表《高举党的总路

南等地群众对于公共食堂的批评意见，主张在食堂存废问题上按群众意见办，“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则将粮食发给群众，让群众回家做饭”。朱德：《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5页。

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8、1141页。

²毛还因此在八届七中全会讲话时夸奖陈云，说“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他犯错误也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武昌会议是陈云一个人正确，但未反映到我耳朵里。1月上旬也是陈云正确”。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另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该文和周恩来的《伟大的十年》相仿，同样对“三面红旗”大加赞颂。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贬斥批判：“1958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展开了工农业生产和文教事业的大跃进，使我国有可能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在去年秋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农村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不满一年，人民公社已经巩固地站稳了脚跟，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并且日益显著地发挥了它的优越性……害怕群众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性，他们在运动面前专门挑剔缺点、夸大缺点，目的是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否定成绩，否定党的总路线……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¹。

从“大跃进”期间林彪发表的公开意见看，他和刘、邓、周、彭等相仿，都属于大跃进的坚定支持者。林尽管因为身体欠佳、较少参与经济工作决策等因素，在“大跃进”决策和执行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但在维护“大跃进”、“三面红旗”乃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方面与前述诸人相比并无逊色²。而上述史实也成为以往研究主流评价分析林彪这一时期作为的主要来源。

但在笔者看来，以往的一些研究者对于林彪的研讨过多着重了这公开的一面，而对于林彪的另一面，尤其是林彪内心世界的诸多真实想法和算计考量，在认知分析方面明显有所不足。中共高层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较少留下关于其内心思考想法的文字记录³。而林彪文革期间因“九一三事件”葬身大漠，其此前写下的很多读书笔记心得被专案组仔细

¹林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李德、舒云主编：《林彪元帅文集》下册，凤凰书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10、216页。

²当然在具体处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方面，林也有相对灵活的一面，邱会作回忆林在彭德怀下台后接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高级干部实现稳定政策，并未借“反右倾”运动大肆整人，“除彭德怀外，被降职的只有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而且中央都安排了工作。其他人一律没有作组织处理”。严文井也在回忆“反右倾”往事时亦提到“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在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央也批转总政的通知，决定反右倾一律不戴帽子，一风吹……”。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09页。

³中共高层领导留下日记、笔记类的资料并公开的较少，而且从公开出版的《杨尚昆日记》等资料看，许多涉及高层博弈斗争的问题在这类资料中依然是讳莫如深为多。

翻查、收缴，借助于这些笔记资料，可以让我们对林彪的复杂内心世界有更好的了解。

林彪一生好读书¹，也喜欢以笔记方式写下他的读书心得体会，而他在不同时期的读书选择和写下的心得体会也往往和该时段的一些重要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经济发展与民生之间的关系，林从早年开始就多有关关注，他在七大所作发言中对于共产主义有一段有趣的解释：“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作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而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过得好，为什么要革命呢？因为很多人的生活过不下去，要使大家的生活过得好，所以要革命。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共产主义，就是干这样的事”²。而在其读书笔记中，对于如何爱民、如何发展生产等问题亦多有关关注，他读《四书章句集注》时写下这样的心得：“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政治→择齐家治国，德为先，爱民为先”，“领袖与群众之关系 君子先慎乎德→得众则得国→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³。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编译著作时，林彪写下的读书笔记极为关注“人民生活需要”之重要性：“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从大众需要上规定斗争口号（即政治）”。“阶级社会与无阶级社会之共同点，社会成立来源皆为了生活。一切为了生活，一切为了能生产生活的资料，一切为了改善生产”⁴。

“大跃进”时期，林作为中央七常委之一，虽然参与经济方面的决策较少⁵，但冷眼旁观，依然留下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分析判断。对于“大跃进”时期产生的所谓新生事务——“小土群”大炼钢铁，林彪在其读书笔记中写下一针见血的批评：“苏联用粮食出口换钢铁机器以建工业，中国亦当先大搞农业手工业换机器以建工业，不要搞小土群而搞大洋群，资本主义亦经轻工（业）为桥梁建重工业，中国亦当来一部分这种经验。则既有饭吃，又

¹关于林彪读书的具体情况，他的几位秘书都有生动的回忆，可参看以下著作，宋德金著：《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皇福图书2011年版。李德、舒云著：《我给林彪元帅当秘书（1959-1964）》，凤凰书品2014年版。

²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5.22）》，李德、舒云主编：《林彪元帅文集》上册，凤凰书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30页。

³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亲笔写在《四书章句集注》（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一）‘大学章句’第10-11页上”，《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二册，第10页。

⁴该笔记系林彪读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解放社一九四三年版）第四分册之心得体会，《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二册，第10、17页。

⁵林因为身体情况等原因，较少出席中央各种会议，但一些重要的会议与活动仍有参与。如58年6月17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薄一波作经济汇报，据薄回忆，除毛之外的常委都参加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98页。

在长工业了。在有粮食多余时则直接搞重工业”¹。在林彪看来，“如主张去搞成本高、质量低的土制钢铁，不若以劳动力去搞农产品手工品去换机器钢铁为合算”²。

随着“大跃进”的挫败，经济危机和饥荒问题相继发生。对此，林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十分谨慎，但在私下里的感触批评颇多。1961年，国内经济危机日趋严重，林在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时有感而发，写了如下断语：“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为生活资料之增长而奋斗，而改善其谋得之诸方式诸条件”³。面对饥荒中出现的死人现象，林在和相交不深的高级干部谈话时可能会轻描淡写的敷衍过去⁴，但在私人笔记中却写下这样愤激的语句：“起码应为人民的生存生活不饿死，不被打死而奋斗”⁵。直到多年之后林对此仍耿耿于怀，在文革时期一次谈话中暗批“大跃进”时期的毛为“拗相公”，指其“不关心国民生计”⁶。

但作为“久经考验”的政治家⁷，林在激愤之余，依然小心谨慎地观察着高层政坛尤其是最高领袖发出的各种微妙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判断与决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必须认真想一想（大丰收而大闹粮，低下头来暗思忖）”。“仔细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谈话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

¹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亲笔写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677页上”，《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二册，第39页。另叶群在59年所做笔记中也写过相似内容，可推断林彪此笔记写于59年的可能性较高。

²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亲笔写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8页上”。《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二册，第40页。

³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一九六一年亲笔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一九五七年武汉印刷）封面里页上”。《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二册，第19页。

⁴据刘顺元回忆，林彪在与江苏领导谈话时针对刘顺元汇报时提及的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出现饿死人现象作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但此一史实的可靠性仍须更多资料加以佐证。丁群：《刘顺元传》，转引自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第64页。

⁵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一九六一年亲笔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一九五七年武汉印刷）第19页上”。《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二册，第38页。

⁶龙哲甫：《林彪、叶群未公开的十八则笔记》，《国际新闻界》1994年第4期，第45页。

⁷聂荣臻回忆早年林彪“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林的黄埔学长胡宗南在抗战时期的日记中这样评价林彪，“胡公冕先生自甘来陕，谈林彪为小资产阶级色彩极浓之人”，“林彪来访……对毛泽东、朱德，则直呼其名，并有誉议之处”。但经历数十年复杂的政治生涯之后，建国后的林早已成为“政治高手”。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843页。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台湾国史馆2015年版，第83、108页。

点，本质。”¹对于毛的个性和政治谋略，林知之甚深，也很了解他在自我批评方面的复杂心态²。故而林一直谨守“自主事，唯胜是图。他主事，唯命是从”的原则，尽可能与毛保持一致。也因此，对于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林做出如许颇为无奈的评价：“总路线——老夫人。明知不是伴，事紧且相随”³。

综合两方面的资料，我们大概可以对此一时期的林彪做出这样的评断，林在高层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无疑是一个“两面人”，他对于大跃进中产生的问题，毛泽东此一时期某些作为私底下都有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但在公开场合，无论是维护“三面红旗”还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林都是立场鲜明的拥毛派。林的这种表现，文革后期批之为“两面派”，而今天的研究者对此亦多有贬斥。

笔者完全同意学者们站在道德立场对于“两面人”所作的批评。但值得诸位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这种“两面人”现象在当时高层中并非个例。以庐山会议为例，不少人上山时或多或少站在批“左”的立场，一旦风云变幻，大家便纷纷加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列。而政治局常委一级的高层行为更为微妙复杂，正如泰维斯和孙万国所指出的，“在以毛泽东为中心作运转的中共高层政治，当毛没有特定看法或定见时，其他领导人可以表达自身的政策偏好并从事游说；但一旦毛清楚地阐明其立场后，其余领导人便难有置喙的余地”⁴。在前述各位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的“大跃进”作为中，积极迎合毛的政治行为比比

¹此两则笔记内容由林彪分别写在富尔曼著《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一书的封底里页和封底页上。《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二册，第37页。

²毛早在57年谈及越南胡志明就土改问题作自我检讨一事时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青岛会议纪要》，1957年7月，转引自李丹慧：《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对越南谈越中关系文件的评析》，崔丕、青山瑠妙主编：《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³刘统：《揭示中南海高层政治的一把钥匙——林彪笔记的整理与研究》，该文已刊于《领导者》2015年第5期，笔者此处引用的是作者之前还未刊用的稿件，第9页。

⁴Frederick C. Teiwes with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59*. 转引自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24页。周小舟在庐山会议后期给毛信中讲到彭德怀写信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表述，堪为泰维斯文所述观点作一注解：“（彭德怀觉得）中央常委之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更不便说话，恩来、陈云同志犯过错误不能说话，朱德同志意见较少，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说。”《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8页。

皆是¹，而敢于犯言直谏的则寥寥无几。如此状况之下，纠“左”还是反“右”完全取决于毛的一念之间，几番纠“左”却成效不彰且屡有反复也就成为必然。而这种高层运作体系在七千人大会上也依然存在，并以类似模式展开新一轮博弈。

三. 大会上的高层博弈之一：

形势判断与责任追究引发的分歧和矛盾

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为了解决粮食征购问题，重要的目标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此前的“大跃进”遭遇了沉重挫折与失败，尽管经济调整已经展开，但遭遇到了重重困难。如何克服经济上的问题与困难？大跃进的失败如何定性？中央和地方应该背负怎样的责任？这些尖锐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都要求中共中央尽快谋得良策渡过难关，摆脱困境。在听取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后，毛泽东最终拍板决定召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五级干部会议，中共历史上参会人数最多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2年初正式召开了。

面对“大跃进”以来的困难和危机，毛泽东和广大干部大都有心怀内疚，愿意总结教训的一面，但作为政治人，种种趋利避害的计算考量依然是无可避免的。在七千人大会的进程中，相关的政治博弈一直存在，并引发了相当复杂的分歧与矛盾。

第一项政治博弈源自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分析。以往的研究成果指出，七千人大会是毛、刘分歧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大会报告稿的起草及讨论过程中，毛、刘在对于当前形势的估计判断上有明显的差异，也因此产生了微妙的博弈。在报告稿的起草上，刘少奇主张“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²，认为报告稿第一部分“形势与任务”把“当时困难的经

¹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不只一次的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这种心态在当时的高层中可说是极其普遍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81页。

²吴冷西：《国民经济的调整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形势估计得太轻了”。而毛泽东当时的看法则认为“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¹。持有如此看法的毛泽东当然对于在刘少奇影响下修改后的报告稿第一部分不满意，“这样的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肯定不够，否定太多，要达到为大家鼓劲的效果，恐怕很难成功”。所以毛的对策是直接这份讨论稿发下去，让大家讨论，以此对刘少奇主导的报告起草工作构成某种制衡。

“（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²。之后经过讨论，对下发的讨论稿进行了相当的修改。最后成稿的报告更多地肯定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在提到缺点错误的同时再次明确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毛泽东的一贯正确³。

值得注意的是，刘在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讲话（亦称口头报告或补充报告）中，虽然仍肯定三面红旗，但整体叙述语调却日趋低沉，肯定判断的语气不断下降，“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所以，人民公社要继续办。‘一大二公’的口号也要保存，将来再看”。“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⁴。正如张素华书中所言，“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即三面红旗是否正确——引者注），是在尽力维护‘三面红旗’。但比较他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则可以判断他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⁵。刘口头报告中对“三面

¹《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2页。

²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8、49页。

³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114页。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年1月27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53-355页。

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31.htm>。另可参见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页。

⁵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红旗”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是软弱无力的，低调的，毛对此自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¹。

对于形势判断的分歧不仅出现在毛、刘之间，由于报告稿讲缺点错误较多，“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的过份了，一片黑暗，越看越没劲”²。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讲话时也提到，“曾希圣同志那天在彭真同志那里讲，希望我报告时鼓鼓干劲”³。周恩来在报告稿讨论时提出，“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柯庆施则说：“十条成绩，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三个口号取消了也不行”⁴。可见要把“缺点讲透”面临着不小的阻力。而围绕当前形势判断的微妙博弈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仍在进行着，直到62年下半年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严厉批判“黑暗风”之后才算尘埃落定。

第二项博弈则存在于地方与中央之间，七千人大会召开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前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困境。也因此，围绕反对分散主义和中央地方间如何分配“大跃进”错误应该承担的责任，地方的封疆大吏和中央领导之间展开了微妙而又激烈的博弈。

谈到反对分散主义，中央和地方泾渭分明。刘、邓、周、陈等常委，李先念、李富春等中央部门领导都认为要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甚至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分散主义是“道德品质有了问题，走黑路”。不反分散主义，“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但“封疆大吏”们对于这些说法很有意见，上海的柯庆施讲“反对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湖北省长张体学则认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

¹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过这么一番话，“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时过境迁，彼时的毛已将刘视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回顾历史时难免存在“倒放电影”的问题，但要说刘当时的口头讲话在毛看起来有顶不住了、泄气之嫌，还是较有可能的。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02.0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²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³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两次讲话（1962年1、2月）》，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32.htm>。

⁴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2页。

¹。身兼中央和地方重要职务的彭真在这个问题上也偏向地方一边，认为“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逼得中央签字；第二才是地方”²。

在争论反对分散主义的背后还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央与地方承担“大跃进”错误责任的划分。虽然毛在开会前讲了，报告稿中也作了相应的表述，强调中央责任大于地方。但微妙的博弈在大会讨论中依然延续着。有人质疑错误到底是路线性的，还是仅限于执行中的问题。有人讲“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陶铸甚至在讨论中提出：“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³。

第三项博弈则是关于中央高层中的责任认定。按照毛开会前的设想，要把七千人大会“当作小整风，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尤其是对中央的错误要进行批评总结，“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各省不能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议讲清楚”⁴。毛的这个决断就把中央层面应对此前所犯错误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央高层领导面前。

按照毛在“大跃进”初期改组的中央架构，是“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要检讨“大跃进”期间中央层面犯的错误，就意味着中央常委中较多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⁵、

¹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99-101页。

²《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³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71页。

⁴1961年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据彭真年谱应为中央书记处第297次会议），转引自张素华：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1页。另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1页。

⁵毛在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解释为什么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时讲到“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

负责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负责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及非常委的彭真（协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都面临着一定的责任承担压力。

将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由老天爷承担是一种皆大欢喜的选择¹。1961年2月刘少奇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时这样介绍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状况及其发生原因：“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同时还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影响了整个国家，农产品供应短缺带来的问题开始出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中国，过去两年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产量严重下降，深刻影响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影响农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有两个：（1）自然灾害；（2）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两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灾害……近两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无疑被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加剧了”。刘在会谈中还告诉苏联大使，“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两到三年自然灾害牢牢挟持着国家。作物歉收，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荒……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曾经出现过的，当然，也可以是会发生的”²。

刘少奇所说的“大饥荒古已有之，难以应付，死人难免”的观点在高层中也有共鸣。比如彭真在这一时期对于天灾的负面作用就多有强调：“分析发生困难的原因，彭真虽也谈到过工作失误和‘五风’影响，但他讲得更多的是天灾。彭真说：‘老天爷就是不拥护总路线、大跃进，搞得粮食紧张，布匹紧张，又不能投降美帝国主义，还是人定胜天。’他说：现在生活是苦难的，为什么？两年大灾。‘今年这么大灾荒，一百年来没有’”。

“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的一月十五日，彭真曾致信毛泽东，送上清光绪二年至四年的三年间山西南部地区发生灾荒情况的材料《光绪三年年景录》。信中说：‘在这三年灾

个，但是我是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据吴冷西回忆，刘少奇在报告稿起草期间谈到中央作自我批评问题时表示自己要做自我批评，“因为自从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般都是少奇同志主持，主席必要时才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一般他是主持政治局的常委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317页。

¹三年困难时期的灾情实际情况如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比较赞同当时有灾但天灾并非造成三年困难主因的判断。具体的相关讨论可参见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第一章“天人之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²《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1961年2月2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第九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92-293页。

荒中，晋南有些县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又从有些县志记载和现在发现的碑文看，‘当时河南一部分地区的灾情和死人的严重程度也差不多。从此件可以看出，当时对连续三年的大灾荒，是无法对付的’。彭真这时送上有关史料并对毛泽东写信，他显然认为困难主要是天灾造成的，并说明大灾之年饿死人难以避免”¹。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产生困难原因时，陶铸提出“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随即插话：“三年灾害不可低估”²。

但把责任全推给老天爷，忽视“人祸”的可怕杀伤力很难令深受“人祸”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信服，也不利于中共总结教训，改正错误。而且毛到了61年左右也开始在一些小范围的谈话中承认人祸问题的存在³。到了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刘少奇的说法开始有明显的变化：“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我看，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书记。我问过陶鲁笱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⁴。

既然是“人祸”为主，当然要分析探讨乃至追究相应的责任归属。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在这方面相对比较超脱。中央政治局是管大政方针的，而在肯定“三面红旗”

¹《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6、1063页。

²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³毛泽东61年2月8日晚同浙江省委领导谈话时就问：“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浙江省委领导回答：“主要是‘五风’，瞎指挥”，并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随即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页。

⁴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28.htm>。另可参见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337页。

的大氛围下，中央政治局要为“大跃进”错误承担的责任自然比较轻，刘在这方面当然也可以比较高调一些，“少奇同志说，凡是政治局工作的错误，我首先负责任，因为我是在第一线主持政治局工作，多数中央文件都是通过我的手发出去的，我不作自我批评，下不了台，也不能服众”¹。从某种程度而言，在责任承担上少了趋利避害的微妙考量，倒是让刘少奇可以更多地深刻反思“大跃进”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带来的巨大危害²，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作的口头报告虽然还是维护“三面红旗”，但对于缺点错误的批评更为尖锐，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的重申，讲“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对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的评断等等，都或多或少地突破了以往中共总结“大跃进”错误教训的某些微妙的禁区。能较为坦诚地面对此前的重大错误。刘的讲话确实有其可贵之处，而毛、刘之间的微妙矛盾也因这篇讲话进一步扩大³。

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采取的对策则是深刻检讨自我责任，为毛积极揽责。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中央书记处决定选编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部分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文稿，“以便对中央工作会议有所交待”。61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展开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和就选编文件给毛和中央常委提交报告。邓在会上明确提出：“这几年工作中有一些错误、缺点，其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总的来说，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⁴。在18日的书记处会议和2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邓又讲：“过去高指标是错的，第一是

¹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²邓力群对于刘反思“大跃进”错误有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后来我参加修改他的口头讲话时，在把大家的意见向他汇报中间，他不断插话。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情绪很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³胡绳后来回忆七千人大会时说：“刘少奇在台上讲，毛泽东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够接受”。采访胡绳记录，1994年8月4日，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7页。

⁴邓小平在1961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7页。另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6页。

中央负责，主要是书记处负责”¹。“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指《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文本——引者注），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的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²。邓和书记处的上述表现，让毛也有所动，在常委会上表示，“你书记处写一个报告，什么都是执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执行不够，执行也有偏颇，你们把我当成圣人，不是闲人已经不错了，你们不批评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评”³。

当然书记处在承担责任方面也是非常有分寸的。根据七千人大会前的安排，中央书记处要整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部分中央文件，当时协助邓小平处理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安排北京市委协助此项文件的整理检查工作。北京市委随后抽调了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11人、工作人员7人在畅观楼对中央文件进行清理检查，并整理了约2.3万字的《中央文件摘要》于61年12月20日刊印，此即为文革中判定为反党阴谋活动的“畅观楼”事件⁴。

刊印的《中央文件摘要》共涉及93个文件，“它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下发的决议、决定、指示等文件，共19件”，“第二类是中央批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所属部门、地方党委的文件，共74件，其中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51件……地方

¹邓小平在1961年12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第1676页。

²邓小平在1961年12月21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页。另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第1679页。

³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另可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0页。

⁴认为“畅观楼事件”是反党阴谋的说法自然是子虚乌有。参与该次文件检查的宋汝芬回忆说：“参加查阅文件的同志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谭震林，说他压指标，说北京是锅底；对新华社，说乱放卫星。但这些批评都还是在中央纠正‘五风’的范围之内，当时就公认的，并不尖锐，对党中央、毛主席更没有讲任何看法……而且当时我们对党中央、毛主席都很崇拜，认为毛主席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确的，现在出现的一些困难，是下面执行中出了一些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的决策还是正确的”。从他们编辑的《中央文件摘要》内容来看，宋的回忆还是较为可靠的。宋汝芬：《我所了解的“畅观楼事件”》，《读书文摘》2013年第10期，第12页。

党委的23件”。“在第一类文件中，作为负面政策清理的有7件¹……作为正面政策肯定的文件有12件……占第一类文件的63%”。“在第二类文件中，作为负面政策清理的文件有63件，约占第二类文件的85%；作为正面政策肯定的文件有11件，约占第二类文件的15%”²。很显然，上述整理中央文件的做法无疑大大缩小了中央书记处对于错误所应负的责任。错误的产生更多与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乃至地方领导有关，书记处主要负“失察和轻信的领导责任”³。

与此同时，彭真还在中央会议上向部分中央常委追责。在1月11日举行的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二次会议上，彭真就工作责任问题提出“总结经验教训时，要把中央和政治局有些常委包括进去。中央的责任，第一是书记处，第二是部分常委。书记处的责任比常委多得多，但各有各的责任。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他的责任也不要回避。因为有些事他们知道，他们参与，检讨中如果不包括他们，第一，不符合事实；第二，会造成错觉，凡是领导都没有错误”。18日举行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彭真进一步对“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在又一次谈到责任问题时，彭真讲了这么一番话，“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不良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18日的发言以往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赞许，甚至认为是“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彭真此举的复杂内涵学者们也有了更多不同的看法。

¹这7个负面文件有相当多的比例与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有关，如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成都会议通过，58年4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等，总之不能让中央书记处一家负责。傅颐：《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49页。

²傅颐：《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49页。

³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31页。

⁴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页。

笔者以为，从彭真在会前向毛提供天灾资料的举动、中央书记处顺利通过全面肯定毛“大跃进”指导的报告看，彭在会上专门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毛的可能性很低，“曲线”维护毛泽东的可能性较高。还应注意的是，彭真此举的批评指向有可能是针对其他高层领导人。如果全面考察彭真11日和17日发言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到彭真在责任认定方面非常关注毛、刘及邓之外的“其他中央常委”所应担负的责任，而联系他就反对分散主义的相关发言内容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在“大跃进”期间发挥的实际作用，彭对“其他中央常委”的追责矛头更大可能是暗指国务院方面的负责人¹。

但彭真的这次政治博弈行动并不成功。在彭真发言之后，周恩来很快做出了明确的回应。“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舛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周的回答很巧妙，他没有纠缠国务院及中央部门在“大跃进”错误、分散主义问题上要负多少责任，而是以大力维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承担责任，强调在毛领导下的团结统一。周的上述说法，既能顺应党内普遍信赖毛泽东的政治心态，又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向毛表示他维护“三面红旗”的坚定立场，可说是在这场博弈中已立于不败之地。而第二天陈伯达也以维护毛的姿态猛烈质问彭真，“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面对陈伯达的质问，彭真不得不立即做出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¹从彭真18日的发言内容看，他对于中央各部门在“大跃进”中的作为有不小的积怨：“分散主义不能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如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军委、天津市干的……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那么马列主义呀！”而七千人大会之后彭真在北戴河会议期间的某些举动（详见本文第五部分），更可以反映出彭和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博弈。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2-103页。另可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¹。彭真的这次发言，虽然在后世得到颇高的评价，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其引发的反应却相当复杂微妙²。

彭真发言引起的这场争议虽然很快过去，但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批评和追责压力，双方间的博弈仍在延续³。而参加会议的地方干部中也存在着不小的矛盾分歧，不少封疆大吏们大权独揽、“一言堂”惯了，要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反省检讨此前犯下的严重错误，绝非易事。刘少奇1月27日作口头报告后，地方干部反响强烈，尤其是部分省份的地县干部此前就对所在省领导多有不满，而不少成为众矢之的封疆大吏却还在继续“捂盖子”。两者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化⁴。整个会议在诸多复杂博弈的作用下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僵局之中。

四. 大会上的高层博弈之二：林彪发言及大会之后的变局

面对大饥荒，自59年开始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在如何安排军队渡荒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据邱会作回忆，为了解决军队面临的经济困难，他力主安排军队搞生产渡荒。但总后的“自己动手搞生产”建议却受到总政“突出政治”意见的反对，由贺龙主持的军委会议而未决，邱后来又向总参谋长罗瑞卿直接提出建议，罗又没有给予及时回应。无奈着急的邱直接上呈林彪，在得到林彪的同意和支持之后，军队搞生产的“光荣传统”才得以恢

¹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9-111页。

²尽管毛此前在一定范围内作过某些相当激烈的自我批评，如60年6月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议时讲到“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不是发疯吗？”但毛作自我批评和他人的批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王海光在其论文中提到，“毛泽东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自己可以讲，其他人是讲不得的，这是当时党内普遍的心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34页。

³周恩来2月7日大会讲话中代表国务院作了深刻检讨，但其讲话中专门提到“国务院的具体工作都是在书记处的领导下的”，可谓意味深长。《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⁴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上讲话时就严厉批评安徽领导（曾希圣）捂盖子的行为，讲话中还提到安徽干部的愤怒和检举揭发：“首先要出气，要充分发扬民主。在座的有一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我没有带来，他说他抱着一肚子气希望要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安徽有些同志肚子里的气没有出完。安徽这几年的工作，有成绩有缺点，成绩好讲，缺点就不让讲，不敢讲，这种情况就不好了。既然有缺点有错误，就应该揭盖子，就应该把盖子揭开……安徽盖子到底揭了没有，揭得彻底不彻底，如果还揭得不彻底，再揭，揭彻底”。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两次讲话（1962年1、2月）》，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年6月-1967年7月）》（网络电子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iushaoqi/1967/132.htm>。

复，而随着部队业余生产的开展，“从一九六一年夏季开始部队填饱肚子就基本解决了问题”。之后“军委和林总下了很大决心，把军队搞农副生产定为一九六二年中心任务之一”。通过推动军队生产，取得了很大效益。部队“渡过了灾荒，保证了部队指战员的体质，部队的连队基本上没有一个浮肿病”¹。

主持军委工作的林能够尽力解决部队的粮荒问题。但面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饥荒，如前所述，在“毛主席”的背景下，林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在七千人大会开始的前半段，林并不活跃。但对于大会的动向，林一直密切关注着，七千人大会召开以来种种复杂微妙的矛盾分歧乃至博弈，林彪也是看在眼里。也因此，当林决定讲话时，原来由总参谋长罗瑞卿组织人为林彪起草的稿子很快被弃用²，林彪自己“拉条子”，拟定讲话大纲，并于1月29日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小时的充满林彪个人风格的讲话。

从林留下的读书笔记看，林彪对于“三面红旗”产生的问题和毛应负的作用有颇深的认识，但他的讲话却尽力为“三面红旗”辩护，并对毛进行歌颂和吹捧。对于林的此一作为，以往的一些研究者借助于林彪的一些笔记推断林讲话的目的是出于讨好、迎合毛的功利心态，甚至是个人野心家的权谋等等。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笔者以为这样的结论恐怕过于简单化了一些³，而且所做分析依赖的证据较为薄弱⁴，分析过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以后来的历史发展反推的“倒放电影”之思路⁵。

¹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333、335页。

²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49页。

³林彪不是圣人，作为中共高层领导的一员，说他清心寡欲，并无向上之心，自然是虚妄之论。但正如钱庠理所指出的：“如果推测说，由于林彪这个讲话，表明他这时已有了进一步‘篡夺’更高权力的意图，那显然是牵强的”。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第126页。

⁴像张素华书引林彪笔记“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来说明林竭力迎合毛泽东的目的。但林彪也抄录过唐玄宗写下的“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的句子警惕自己，他读《曹操》一书，在看了该书叙述曹操当了宰相，已成“骑虎难下之势”的内容后，即在该页上写下“不要轻易骑上去”的批语。如此等等，可见林笔记中展示的林彪形象是复杂多面的，简单下结论并不可取。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0页。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⁵钱庠理认为，刘1962年初的时候接班人地位相当巩固，其“接班人地位的合法性，不仅由组织程序而规定，同时也出于毛泽东本人的安排，并经过了历史的确认。其他人如周恩来、陈云的政治顺序都在林之前。林彪离权力顶峰还有相当距离。林在中共核心圈内是最小的成员之一……毛泽东虽器重他，但在正常的接班轮替中，林肯定还要排很长的队。更何况，包括毛泽东自己也不能预料，几年后会出现一个‘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原有的政治秩序”。笔者同意钱著的上述论断，毕竟林不是穿越者，就算他有极强的向上之心，但从他建国后一直较为谨慎的政治行为作风看，林不会简单押宝在一个未来变数很多的希望上。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126-127页。

因此，笔者在本部分尝试以史料为基础对于与林彪此次发言的多个相关问题做出解读和分析，希望能尽量做到客观持平。

首先要分析的是林彪此次讲话的动机，正如前文所说，林的讲话绝对包含了功利性的动机，毛对于部下的考察检验，往往会看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是否会站在他这一边，这种时候部下的立场态度，至为重要。担任过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逢先知写过一段话，揭示了党内高层政治在此问题上的微妙规范：“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的。但是，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¹。前面提到的邓、周等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也可以充分证明这条潜在规则对于党内高层来说早已不言自明。林对此自然也早已了然于心。

林讲话的动机之二是基于复杂的山头本位利益。林是随朱德上井冈山，但在之后的“朱毛之争”中坚定地站在了毛一边²，之后深受毛的欣赏和信赖，毛、林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³。林逐步成为毛的嫡系大将，井冈山系统乃至“红区党”的重要代表人物。50年代前期发生的高饶事件中，因安子文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高岗带头拉了二三十位军队和地方高级干部去西山看望林彪，是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颇为戏剧性的一幕。而林彪当时的山头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⁴。高饶事件虽然在55年以高、饶被开除出党而告一段落，但红区党和白区党乃至更多山头之间的纠葛斗争并没有画上句号，在之后的岁月中仍若隐若现地延续着⁵。此番七千人大会上展开的政治博弈中，山头之间的矛盾也同

¹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72页。

²毛在66年同胡志明谈话时还专门提到：“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³关于这方面的史实例子极多，此处不多赘述，仅举二例，据师哲回忆，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毛泽东专门起大早去接林彪，令师哲大为惊讶。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邱会作回忆录》则提到毛在长征中一直受到时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的特别保护和照顾，过草地时专门送了一个八个人的担架班和一头壮实的骡子为毛服务，还把自己的运输员也派来了。“中央纵队通过最危险的一段软草地时，林彪、聂荣臻等候在那儿，看到毛主席等人通过之后才离开”。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第73、75页。

⁴赵晖：《林彪与高饶事件》，《记忆》第92期。

⁵邱会作在其回忆中提到八大时某些为“白区党”造势的言论，如“干白区党的比二万五的（军队干部）斗争更艰苦，因为是老虎肚子里活下来的”。而且在八大上白区工作的干部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比例较高，而军队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

样浮出水面。吴法宪晚年回忆七千人大会，就提到当时“军队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¹。

动机之三则是林彪对党内团结问题的担忧，主流文献、研究著作对于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分析叙述，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运用在林彪此时的某些考量上，对于七千人大会前半段党内高层、中层之间的复杂矛盾冲突，林彪颇感忧虑。一方面，林认为维护毛的威信对于党的团结至关重要²，围绕“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发展下去，可能会产生对毛的直接怀疑批评，引发更多不可测的因素，对党的团结构成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林也不希望这场大会变成互相指责、争吵的会议，在大肆批评、揭露缺点、错误之后变成泄气而非鼓劲的会议。就维护党内团结、鼓舞提升士气的立场而言，林彪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所谓的“顾全大局”。但这种无条件迁就毛泽东错误的团结实际上是“跟人不跟理”，也是对党真正团结的破坏。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种“顾全大局”的想法和做法，在那一段历史中多有发生，许多错误和悲剧也正渊源于此。

基于上述复杂动机的综合，林在准备讲话内容大纲时特别注重“鼓劲”和“团结”。据林彪当时的秘书李德回忆，林在准备这次讲话时专门问过“苏联是否有过类似我们这几年的困难情况”，试图从苏联历史变迁中取经³。在毛家湾查抄的林彪笔记中，有一则是林彪62年1月23日为准备29日讲话思考的准备方法和注意要点（由叶群作记录），共11条，其中多数是一般性的讲话准备和演讲时应注意的技巧方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十条，“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⁴。从林讲话的内容看，这一条在讲话中贯彻的十分明显，也在相当程度上达到林维护“团结”

名额却很有限。在邱看来，由此导致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间的矛盾，为文革埋下了隐患。《邱会作回忆录》，第233-234页。程光：《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

¹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吴此一回忆目前尚为孤证，但结合其他的一些相关史实，可以初步判断该回忆有一定的可靠性。

²王海光说这种思路是“党内一种护短的狭隘心理”，笔者也同意这一判断，而考察党史，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做出的许多相忍为党，积极跟随毛泽东错误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种狭隘心理所牢牢支配。

³李德 舒云著：《我给林彪元帅当秘书（1959-1964）》，凤凰书品2014年版，第118页。

⁴龙哲甫：《林彪、叶群未公开的十八则笔记》，《国际新闻界》1994年第4期，第48页。

之目的。

既要鼓劲，又要照顾大家利益。把“大跃进”造成的恶劣后果让老天分担是最合理的选择。林讲话中提到发生困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连续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有些地区甚至毁灭性的），无论如何造成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¹。钱庠理认为林彪这一论断自有其道理，还举出具体的灾害情况为证²。但问题在于，从林的读书笔记可以看出林私下里完全是“人祸”为主论的赞同者。所以这一段话中自然包含了很大的“违心”成分。当然诿过于老天爷不是林彪的创新，之前早已有人为之了。

在让自然灾害承担部分责任之后，林比较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下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强调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总路线的错误。即在具体执行中，对于指示的安排、各方面的照顾协调上，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是有缺点的。这些方面的缺点，同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也是有关系的”。同时，林大力维护“三面红旗”，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³。和刘讲话的相关内容比，林是明显的高调，而刘则偏于低调。

从鼓劲的立场出发，林还提到，“这几年来，全党的这种的干劲，艰苦的奋斗精神，总是可嘉的”⁴。搞坏事情，更多是缺乏经验。也因此，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只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至于林讲话中那段著名的“付学费”说法，其实是“没有或缺乏经验”的一种翻版说法，有学者认为林彪把这种说法放大到如此极至，“使毛泽东多少增加了些底气”⁵。毛是否因林此一说法而增加了不认错底气，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协调各方利益角度出发，这种说法倒是“和稀泥”的高妙手段，大家都可以借缺乏经验为自己的错误作有力辩护，所以与其说是“付学费”说法单单影响了毛泽东，还不如说该说法是缓解了每

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2.1.29），李德、舒云编：《林彪元帅文集》下册，凤凰书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07页。

²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第120-121页。

³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2.1.29），李德、舒云编：《林彪元帅文集》下册，第306-307页。

⁴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2.1.29），李德、舒云编：《林彪元帅文集》下册，第307页。

⁵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4页。

个与会者面临的问责压力。至于这一说法在大会上到底产生了多大的综合效果，那就见仁见智了。

林之后的一大段“加强团结”的发言内容受到后世研究者们最严厉的批评。林讲话中认为，团结首先要建立在“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领导”的基础上。“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¹。林的这段毛一贯正确的“高论”，一直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口诛笔伐，认为林颠倒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无耻的吹捧毛泽东等等。笔者也同样认为林彪对毛的上述吹捧脱离实际状况，甚至是极大地歪曲了“大跃进”以来的相关事实。但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林彪的这种叙述模式到底是他所谓个人野心权谋的孤立行为，还是当时党内不少人所赞同的“共识”？王海光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讲话中的不少观点，“在党内并非林彪独有，是很有思想基础的。林彪的出彩之处，是以他的威望和经历，强调毛泽东的一贯正确”²，仔细梳理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相关史实，可以发现王此言相当属实，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补充。邓小平、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大会发言中³，也同样强调了毛的一贯正确。而代表了“集体智慧”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最终修改发表的大会正式报告，同样对“毛泽东在纠正错误上所做的贡献”大唱赞歌，其措词和林彪谈话的相关内容大同小异：“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

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2.1.29），李德、舒云编：《林彪元帅文集》下册，第308-309页。

²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34页。

³邓小平2月6日讲话中说：“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为什么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呢？原因是多种的，我认为首先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的教训是，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我们有许多错误是从这里来的”。周恩来在2月7日的大会发言中讲到：“‘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2、316页。《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13页。可参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¹。七千人大会的最大局限所在，是大家集体的“顾全大局”，尽力维护毛的一贯正确。当然在这场维护颂扬毛的大合唱中，林绝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日后也确实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回报。

林讲完之后，毛泽东立即表示了鲜明的赞扬态度：“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²。大会的多数参加者也对林彪的讲话表示了极大的认可³。

林讲完之后毛跟着发表的简短讲话中，还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延长会期，开一个“出气会”。毛在谈话中强调要发扬民主，让大家出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要建立民主集中制”，他还在讲话中公开作了一点简单的自我批评。毛的这段讲话虽短，却获得大家的热烈认同。之后的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继续做自我批评的同时，对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毛这篇讲话中讲了不少清醒的好话，也对以往的错误有了一定的反思。

毛讲话之后，大会转向“出气会”阶段，在最高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的示范下，各省的第一把手们也开始不得不做出或深刻或勉强的检讨，各省的“出气会”总体上算是顺利开展，此前的僵局有所打破。到2月6日邓小平、7日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做检讨，承揽相关责任后⁴，这场“出气会”总算获得了较为完满的结果。七千人大会开

¹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4页。

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2页。

³《七千人大会简报》就收入了不少关于林彪讲话的正面反映，很多人相当认同林讲话的相关内容，认为林“讲得十分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林总的报告，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等等。吴法宪回忆“林彪讲话以后，军队的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的讲话讲得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7页。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页。

⁴邓在6日讲话中说：“在这次会议上，各个小组批评省委的，或者批评地委、县委的，有不少事情应该由中央来负责。……省委、地位、县委自己应该负责的，自己在自己那个账本里边去写。但是，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周恩来在讲话中代表国务院承揽责任，作自我批评：“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达、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

了近一个月，围绕“三面红旗”的争论虽然远没有结果，相关的不少分歧矛盾也依然存在，但这次会议总算是通过发扬民主（或曰“出气”），由毛泽东带头，从上到下在一定程度上都进行了自我检讨，部分化解了“大跃进”几年来累积的不少政治矛盾，有利于推进党内的团结统一，振奋干部情绪，“对动员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大跃进’带来的困难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¹。

七千人大会后半段的变局无疑和毛泽东的一系列决断和作为密不可分。笔者在此还想探讨一下林彪讲话和这场变局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分析探讨这场变局的局限所在。

根据《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相关记载，在刘少奇27日讲话后毛宣布的会议安排是“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但在29日林彪讲完话之后，毛却改变了主意，决定延长会期。并将会议的方向更多转向“出气会”的模式。毛为何有如此改变？《毛泽东传》和张素华书都给出了一些解释。将之归因为地方干部在此前的讨论中难以畅所欲言，尤其是“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²，所以毛才有了“趁热打铁，再拿出几天时间，给地方干部出气，让他们把‘气’出在北京，轻轻松松回去的决定”³。

笔者认为这些解释较为合理，但仍有可以继续探讨之处。毛的这一改变，不仅是让干部出气，更是将会议的主调从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路线、方针（三面红旗）的探讨问责转向了发扬民主，积极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实现“上下通气”。而林讲话对“三面红旗”进行“高调”肯定，扭转此前大会的“低调”氛围，对毛因势利导实施上述转变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⁴。

另外，在此还要谈谈笔者的一个大胆假设，林、周、邓等人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对毛泽

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14页。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¹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37页。

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2页。

³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57页。

⁴至于这种作用到底属于正面负面，笔者以为，从七千人大会能开成一个最终达成团结，大家或多或少能有检讨反思的会，林的作为有一点正面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片面维护“三面红旗”的作法，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

东和‘三面红旗’的大力维护是否可视为一种曲折的“进谏”方式，或曰“曲线进谏”¹。在林读书笔记中有一段颇为晦涩的断语：“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²。笔者以为其大概的意思是要尊重毛的领袖地位，服从毛的领导，让他没有被架空，被蒙蔽，以及有所谓独立王国对抗他的感觉，毛自然不需要建立、依仗新的小帮派来进行更为激烈的政治活动与政治斗争。对毛的功绩、新思想及时进行歌颂赞扬，则毛自然无须要特意搞一点个人崇拜。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林对毛的观察还是相当深刻的。以个人崇拜为例，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个人崇拜受到了严厉批判，中共在当时也明显受到了苏共此一变化的影响。毛却在58年树起“两种个人崇拜”的大旗，要为“正确的个人崇拜”正名，“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到了文革，对毛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却要说某些对他的“个人崇拜”行为是“讨嫌”，这里面固然含有某些具体谋略考虑的因素，但毛的微妙心态变化也是明显可见的。在七千人大会前后，邓、林、周等一力为毛揽责，也确实获得了毛的积极回应。邓小平讲毛在大跃进期间的指导完全正确，毛倒是表态要作自我批评。林在大会讲话颂扬毛泽东，毛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便作了一番自我批评，带动了接下来“出气会”的顺利开展。由此观之，这种试图用“迁就毛泽东的错误”之手段以保持党内团结³，并通过触发毛的“自我反省”来纠正某些错误的办法，在七千人大会上确实也产生了某些作用。大会后半段能开得比较顺利，在“出气”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应该说和毛能够作自我批评，积极鼓励发扬民主、倡导建设民主集中制有不小的关系。

但这种“曲线进谏”的负面效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丧失了全党判断是非的能力”⁴，还令七千人大会取得的成果变得非常短命。既然大家都把改变错误的希望寄托在毛的自我反省上面，这种希望本身就是非常脆弱和不可靠的。毛不是圣人，前述

¹笔者创造这个名词是因为传统的进谏讲求为达目的不惜冒犯君主，即所谓“文死谏”。但在当时的党内，要向毛提意见得非常讲求技巧，讲究迂回曲折，所以才要在进谏前面加曲线二字。另外曲线进谏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有很强的自保功能。

²该笔记内容系“林彪亲笔写在《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米丁著，三联书店一九五〇年版）封底页上”。《林彪罪行资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第一册，第2页。

³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34-35页。

⁴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35页。

的决策体系不改变，党内多数人对毛的盲目崇拜不改变，七千人大会上提倡的发扬民主就只能是昙花一现。中国的发展列车在不久后也将随着毛思路决策的新变化而转入新的轨道。

五. 七千人大会后的博弈余波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在2月8日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表示“一张一弛，现在要弛一下，不要搞得太紧了。七月开北戴河会议，几个月内不开会”¹。会议结束后毛便坐专列南下。中央工作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刘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在判断目前形势与下一步发展趋势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矛盾。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刘对于当前形势作了较为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现在处于恢复时期……是个不正常的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更糟糕，“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²。刘的这些观点，和毛4月份讲的“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³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异。而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对困难的认识上虽然更偏向于毛一些⁴，但在实际的调整工作中还是更多的站在刘一边。刘这一时期还发表

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555页。另可参见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

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0页。

⁴周恩来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确实是度过了。”邓小平在会议上所做讲话中表示：“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周总理对这几天问题的讲话，我没有不同的意见”。邓讲话中提到的中央财经小组报告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这么判断的，“这次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时候，财经小组的同志认为，当前的政治形势，包括方针政策的贯彻，干部经验的积累，党和人民的团结经受了考验，等等，都是好的；在财政经济方面……我们说最困难的时期基本上过去了”。周恩来：《认清形势，掌握主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邓小平：《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中共中央批转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报告〉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五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7页。

了一些相当尖锐的看法和批评意见¹。

毛在62年的不少时间里“云游天下”，62年中，他从地方上得到的消息是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²，这与北京当时比较灰暗的形势估计恰成对比³，进一步坚定了毛批判“黑暗风”的底气和决心⁴。

而在是否采用分田到户的方式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一敏感问题上，尽管陈云的意见得到刘、林、邓等多位常委的赞同⁵。但毛“雷霆一怒”⁶之后，各位常委便无人再敢置喙。相反，大家纷纷表态，尽快跟上毛的新步伐。7月初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到陶铸、柯庆施传话，“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彭真即表态：“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应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接着说：“我倾向这样”⁷。

一旦毛泽东决定转向，批判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大家便纷纷响应跟进。而此前的某些微妙博弈也在这时候继续展开。7月18日下午，毛泽东同杨尚昆谈话，其谈话要点有二：“①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②对计委、商

¹如刘在西楼会议上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3月中同罗瑞卿、王任重、谢富治谈公安工作时讲：“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刘还讲“你们怕‘右倾’吗？无非是撤职，坚持真理，撤职也是好的，也光荣嘛”。刘之后未同意印发该讲话要点。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552页。

²毛62年6、7月在河南、山东等地得到的消息是夏粮增产形势很好，这无疑加强了信心，更坚定地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³周恩来1963年6月同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谈话时讲到：“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要好一点……主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他说形势不那么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⁴毛1962年6月初在杭州与韩先楚、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等军队将领谈话时向他们了解夏收情况。当时军队将领表示不赞成“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毛即表示：“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⁵陈云在71年913事件后回忆过这段往事：“当时主席未回北京，先与刘少奇谈，刘同意。又与林彪谈，林彪也同意。找邓小平谈，邓答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方式。再与总理谈，总理第一天听后说要考虑一下，到第三天总理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2页。

⁶陈云向毛泽东进言分田到户，毛当时未表态，但次日严厉批评“‘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陈云闻讯后“久久沉默不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2-1323页。

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5-2196页。另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3页。《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在谈话后“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当晚即告知周恩来¹。也在7月份，彭真在北戴河找商业部长姚依林谈话，8月份又谈了一次²。在这两次谈话中彭真详细向姚询问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领导财经工作的情况³，谈话中彭还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看法：“过去有个时期，听说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听说又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好了”。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期间，彭真又一次找姚依林谈话，提出：“现在党内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斗争的规模很大，比1959年（对）彭德怀的斗争还要大。你应该在中央全会上作一个发言，讲商业工作的问题，不仅要讲商业部的问题，而且要讲商业各部的问题。不仅要讲今后，而且要讲过去的经验教训。现在很多人不听主席的话，你们财贸部门就有人不听主席的话，听说怨气很大。我可以举得出名字，现在就是不举名字……希望你好好考虑，作一篇好的发言，如果你想同我商量，过几天你还可以找我来商量”。姚依林对于彭真找他谈话很敏感，很快向李先念和周恩来作了汇报。而在这之后，彭真的态度起了变化，表示：“党内要团结”，“你在全会上的发言，可以百分之九十讲今后工作问题，只要用百分之十讲过去就行了”⁴。虽然姚依林立场坚定，但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处境仍相当困难，姚依林回忆北戴河会议时提到：“会上（指北戴河会议——引者注）对周总理压力很大，有些人攻击周总理，有些人看风向，党内斗争十分激烈”⁵。而据吴冷西回忆，在与北戴河会议同时举行的城市工作会议上，受北戴河会议大批“黑暗风”的影响，“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在2月和5月会议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有些同志认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非常措施对我国国民经济‘伤筋动

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尚昆日记》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另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²根据《彭真年谱》记载，彭真在62年7月25日下午到达北戴河，“在八月下旬返回北京前，出席了在北戴河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他与姚依林的两次谈话应在此期间。《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³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真等向高岗之妻李力群查问高岗与彭德怀、陈云、林彪等人的关系。62年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又再度向李查问林彪与高岗的关系，但始终未有所获。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转引自丁凯文、司马清扬著：《找寻真实的林彪》，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⁴姚依林：《关于我和彭真的关系》，向中央财贸政治部接管小组汇报的材料，转引自司马清扬著：《周恩来与林彪》上册，明镜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61页。

⁵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骨’、‘大伤元气’，有的甚至不指名地责备主持调整工作的周恩来……有的甚至乘反对所谓‘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替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工作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但人们一听便知是针对谁的……有些同志发言极不正常，不顾大局，特别是有的同志在2月西楼会议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赞同中央决策的，现在又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总理，说话非常难听”¹。

尽管高层内部的微妙博弈不断，但都在紧跟毛迅速转向。薄一波回忆：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刘还讲“前些年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就要花一些代价，吃一些苦，死一些人，都是合乎规律的”²。彭真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发言中则全盘肯定“三面红旗”，严厉批判“三面红旗”的批评者：“‘七千人大会’后，出现了一股‘冷空气’。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持三种态度：一是正视检查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这种人不发生立场、方向问题，但缺乏调查研究。二是抓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标榜自己正确，刮各式各样的翻案风。三是一些右派分子，幸灾乐祸……三面红旗倒不了，没有人民公社，不依靠集体经济，能渡过三年困难吗……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总方针是普遍真理……过去我们大家接受了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但是没有好好研究”³。党内高层中的其他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表现，大抵与刘、彭类似⁴。在毛决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延续多年的决策体系和人们的固有选择迅速有效地让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乾纲独断”，并很快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与奉行，而随着毛的思想越来越偏向“左”的方向，“文革”也正在日益逼近。

六. 结语

¹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第23-24页。另可参见《回忆1962年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吴冷西访谈录》，《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第24-25页。

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4-1075页。

³《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217页。

⁴可参见《毛泽东传》第五册七十“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7-2213页。

在梳理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相关史料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在“大跃进”狂潮中，中共高层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积极参与的，而部分有所保留者也往往在这一时期呈现“沉默”或“两面”之状态。

2. 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共高层存在着十分复杂微妙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理想情怀、道德情操和趋利避害的种种政治考量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幅复杂的博弈图景。正是如此多元博弈使七千人大会的收获变得脆弱而有限，也使得未来更大的政治运动和灾难难以避免。

3.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动机和产生的影响都相当复杂，以往的某些分析或多或少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单一化问题。明君被奸臣蒙蔽的说法虽然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易获得认同的结论¹，但它却在很多时候不符合历史的真相。清高宗曾有云：“本朝无名臣”，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解读毛提倡学海瑞时有过这样的分析：“实际上还是不要出海瑞”²。党内长期存在的对毛之迷信乃至盲从现象，并非是少数所谓负面政治人物的专利。对于这段复杂的历史，我们还需要继续收集整理史料，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林彪研究】

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

丁凯文

从1971年“913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45年。在这45年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文革的极左路线到如今的改革开放，历史迈进了新的篇章。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思想解放，以往存在的不少禁区相继被打破，历史

¹茅海建先生曾有云：“用忠臣而摒奸臣，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中最常青而又最常见的定理之一”。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页。

²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

事件和历史人物得到了新的评价。然而，林彪事件的研究相对而言却不尽人意，虽然与十几年前相比已有不少的进展，但是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推向深入还有待于史学界同仁的继续努力。下面就几个问题谈谈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林彪事件研究的难点何在？

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前些日子有人撰文提出，“研究林彪事件要与传奇演义剥离开来”，“研究林彪事件不能搞道听途说”。这一看法显然针对了民间某些非史学性研究的一些传闻，表面上看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却没有探寻这类问题存在的根源与实质。为何有关林彪事件，社会上会流传某些“传奇演义”与“道听途说”，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国内民间发酵，根本的原因何在？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难判断，那就是执政党没有实践自己多年来所宣扬的实事求是，控制宣传、舆论的部门把持了所有的报刊、出版、广播、影视，乃至互联网，根本不容有违背他们意志的研究成果有自由发表的空间，个别较为开明的杂志不仅受到压制，甚至被迫停刊。那些不得不在海外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的国内作者还会被有关部门找去谈话警告，如此之环境岂能使史学研究得以长足发展？目前国内对林彪事件的阐释、解读只有官方的一家之言和符合官方观点的极为有限的书籍或文章，几十年来学术界从未就林彪事件的研究公开举办过任何形式的讨论会。国内史学同仁面对的现状是，有关机构不仅档案从不公开，还有许多拿不到台面上的清规戒律，学者们自然无从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甚至也没有哪家杂志敢于刊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整个学术界都被“宜粗不宜细”紧箍咒所束缚，不同于官方观点的研究成果只能出现在海外或民间网络刊物。正是因为学术研究的不昌明，言论不自由，“传奇演义”与“道听途说”才会在民间广泛流传，出现了诸如林彪飞机的黑匣子已被解读，林彪死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谋杀等等阴谋论。

杜绝此类传奇演义或道听途说其实并不困难，也无需史学家们劳神费力一条一条予以

批驳，只要有关部门破除禁律，思想解放，开放档案，广开言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学者们根据史料作出自己的研究，自由发表自己的文章，使真相在严谨缜密的研究中呈现出来，传奇演义和道听途说自然就站不住脚，就会消失于无形。当然，这也许仍然难以彻底杜绝阴谋论的出现，但是相信广大民众会有自己的判断，阴谋论也就没有其市场和生存空间了。

二. 摒弃陈旧、僵化的党化思维

国内党史界一直受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束缚，在林彪事件问题上表现尤甚。林彪事件的定性从中共十大到1980年代初期的“两案审判”，都是一脉相承。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更是对林彪事件一锤定音，邓小平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随后不久出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义为“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由此，“利用论”统治了国内学术界。

但是对于毛泽东和文革问题，党内并非没有深刻的反思。1980年10月到11月，中共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中央机关约1000人参与，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参与。在这次大讨论中，老干部们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愤怒控诉、群起声讨。据参加会议的郭道晖先生回忆，铁道部副部长李颀伯在会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中科院副院长胡克实说，毛泽东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文革派工作组是毛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说，梁启超早年

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泽东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铁道部纪委副书记慕纯农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恩来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在1981年7月7、8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这篇貌似公允的说辞就是为毛泽东遮丑，以权力压制党内对毛重评的呼声，扼杀了党内这场思想解放运动。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和回忆来看，毛泽东是文革运动的总策划、总导演、总监制，文革运动中的每一项战略部署和实施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所进行，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或是其他中共老干部，都是毛泽东利用的工具。具体到林彪事件，没有史料证实林彪想通过当国家主席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林彪也没有实施阴谋政变要杀害毛泽东，至于林彪想在广州“另立中央”更是没影的事。

众所周知，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允许一家声音存在，不许其他的不同意见的表达，甚至

将这类不同声音打成所谓“敌对势力”或者“帮派势力”，那么史学研究就不可能有所突破和推进。显然，林彪事件的研究首先就要摒弃陈旧与僵化的党化思维，不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不以毛泽东的标准为标准，破除邓小平的所谓“利用论”，坚持实事求是。用中共老革命家陈云的话来说，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果政治环境开放，思想解放，史学家们都以坚持“只唯实”这一原则为己任，林彪事件的研究必能大大向前推进，而非现在的万马齐喑的状态。

三. 如何看待林彪对毛的私下评论？

国内一些人在批判林彪时常以林彪的私德为着眼点，认为林彪内心阴暗，尤其以林彪私下对毛泽东的评论为靶子。不仅如此，还引申出林彪有一套“登龙术”，为夺取最高权力不择手段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分析林彪这些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呢？

由于缺少林彪写下这些对毛评论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以及针对何人何事，中央工作组和后来的“梁效”将其整理成《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日后批林批孔的材料。我们看到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评毛言论如下：

“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从江西苏区井冈山时代开始，林彪作为毛泽东信任的嫡系部属跟随毛几十年，对毛泽东的性格、心理和行为有着长期的、近距离的深入观察和了解，林彪常常能洞悉毛泽东的

内心，对毛泽东在党内从事政治斗争的模式和手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林彪的这些对毛的看法一针见血，点到了毛泽东从事党内斗争的特点和实质。毛泽东党内的对手们无不下场凄惨，死的死，逃的逃，最后毛自己还落得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美名”。林彪正是洞悉了毛泽东的为人特点，才会在私下里写下这些对毛的看法，主要还在于点醒自己，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与毛的关系，其自保的成分较为明显。但是，林彪文革前对毛过分的谄媚和吹捧，使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毛拥有了发动文革的底气、筹码和依据，林彪自不能辞其咎。

不少人斥责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地里却私议毛泽东。其实即使在那种扭曲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元老们也并非没有对毛的看法，但是他们常常敢怒不敢言，敢言也仅仅是对自己的亲信或家属发发牢骚，更不敢落实在文字上。据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回忆，罗宇陪同复出的父亲罗瑞卿去看望朱德时，朱德发牢骚说：“你看现在，成什么样子，这么大的国家就你一家子管了？”这话明显是冲着毛泽东的，但是罗瑞卿一句话都不敢回应。罗宇评论说：“朱德、罗瑞卿私下议论毛泽东，传出去还了得？！”¹

在1980年10月，中共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中，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干部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陶白最后一句话“不敢讲”道出了多少中共老干部们的心酸与无奈。事实上，这些中共老干部们对毛泽东内心的非议也许并不亚于林彪，只不过他们从不敢公开亮出来，更不敢落实在文字上，也就无从被披露出来。

林彪为何写下这些“私话”？一来林彪可能认为自己不会倒台，这些写在边边角角书页内的零星散语和“警句”不会成为日后政权对自己批判的“弹药”；二来林彪本人性格

¹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9页。

比较孤僻，喜欢独自捉摸钻研，不太会把自己的想法对家人或部属们倾囊相授，因此将自己对毛的一些心得随手写在手边的书页上，犹如古人读书时写的眉批一般，只是作为平时自我欣赏的警句而已，也是对自己的时时提醒。可以说，这是中国扭曲的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林彪不倒台，就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评毛的“珍言”永无出头之日。但是，林彪不幸倒台了，党内抄家灭族式的批判绝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林彪的这些零星散语被中央专案组和“梁效”大批判组搜集整理出来，放大为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的证据。

四. 中共党内是否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

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后军队形势基本平稳，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彼时军委办事组走上了历史舞台。官方的史书总是把军委办事组说成为林彪拉帮结派搞反革命活动的结果。这当然是不动脑子、不负责任的政治归类。自古以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重用原红三军团、一野和志愿军的军队干部，林彪上台重用原四野的干部，邓小平上台则重用原二野的干部，这是权力运作的必然，其他国家的政治也无不如此，为什么偏偏林彪用了黄吴李邱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想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军委办事组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三支两军”、国防战备、国防建设。由于“三支两军”工作的展开，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军人主导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实行了“大联合”、“三结合”，各省的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多。军人执政是那段历史时期最大的一个特色。又由于军中老帅们在“二月逆流”后靠边站了，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到了中共九大，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入政治局全面参与中央日常工作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军委办事组是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已经不仅仅负责军队的日常工作，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

起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实际上是“二月逆流”后离开中央工作的军队老师们的延续。他们进入中央政治局是形势使然，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协助周恩来承担起繁重的中央工作，维系国家的正常运作。

军委办事组是文革某一特定时期负责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黄吴李邱几人绝非参加了“林彪反党集团”或曰“林彪反革命集团”，从事了所谓的“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在军中的职务均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非林彪私相授受。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下，军队被迫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好，在实际工作中都会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甚至卷入地方的派系斗争之中不能自拔。毛泽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时也非军队领导人所能理解，更不用提左右了。所以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产生的消极后果亦不能完全由他们来负。

其实，广义说来，文革初起时，军队里的高级干部们，如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等对林彪都是大力支持的，他们全都是所谓“林彪集团”的人，只不过他们后来都是正面人物，所以不必为他们文革时期的行为负起政治责任。一言以蔽之，军委办事组是“二月逆流”之后军队老师们退出政治舞台的一种填补。军委办事组在军事上接受林彪的指挥，而政治上则接受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领导。林彪倒台后，毛泽东和后来的邓小平把他们划为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是中共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好比高岗倒台后，高的部属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被打为“五虎上将”受到株连是一个道理。

五.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结成“反党结盟”？

2013年国内出版了一本关于林彪的书籍，该书作者认为，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相互勾结，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如今这个年代仍然使用如此陈腐的“反党联盟”之概念实

在令人惊诧，让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那么这个“反党联盟”的标志是什么？作者说：“1966年2月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开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成反党联盟的一个标志。”¹

这个问题，早在2007年余汝信先生和陈昭先生就分别写了《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剖析——驳“林彪江青勾结”论》，发表在笔者主编的《百年林彪》一书上，两位先生就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辨析。

简言之，毛泽东让江青出面找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要求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从1966年2月2日召开到20日结束，解放军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等人奉命参与，所谓座谈会自始至终都是江青一人的独角戏。江青在谈话中声称文艺界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与前不久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遥相呼应。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增删，增加了很多关键的话语。更加巧妙的是毛泽东将纪要的原标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林彪同志委托”的字样，误导他人，造成林彪是整个事件主导者的印象。如此这般，毛江夫妻店自导自演，打着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旗号，炮制出掩人耳目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再由毛手把手地教导江青如何以军委的名义向下传达，将一份军内文件转化为推广至全国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反击彭真《二月提纲》的重磅炮弹。江青自言是请林彪“这尊神”，其实，江青背后的毛泽东又何尝不是要利用林彪这尊神？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该《纪要》，5月5日中央另换批语后再次发出。这份“纪要”成为毛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借机把江青推向政治前台，为日后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做好了铺垫和准备。林彪自始至终没有委托江青召开这个会议，对《纪要》也没修改一个字。林彪在给贺龙等军委领导人的信中不仅指出“主席三次亲自审阅和修改”，还特别强调“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在此根本不承认是自己委托江青召开的这个会议，变相地为自己做了说明。

¹ 周敬青：《解读林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51页。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江青如果要在此后的文革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最缺的就是政治资本。以林彪的名义让江青出头，可以很轻松顺利地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违反中共自己的章程，破坏自定的原则和纪律莫此为甚。这个《纪要》怎么可以说成是林彪与江青结成“反党联盟”的标志？如果说彼时中央存在一个反党联盟的话，那么这个“反党联盟”的盟主就是毛泽东，江青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再说，1966年初存在这么一个“林彪集团”吗？如果存在的话，这个集团里又是些什么人呢？总不能把黄吴李邱算进来吧？按照该书作者的逻辑，林彪集团难道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叶剑英、聂荣臻这些老帅们以及当时参与军委日常工作的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这些人？

把林彪与江青的关系用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联系在一起，生拉硬扯成结为“反党联盟”，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六. 林彪对文革的态度

林彪在文革中的基本态度和表现是消极和不作为的。除了在文革初期时配合毛泽东多次走上天安门发表讲话和检阅红卫兵外，林彪基本上不愿出席公共场合的活动。长期在中央工作的王力对林彪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认识，王力曾这么回忆林彪：“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纪登奎也有类似的回忆：“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

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

文革中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战略部署都是毛泽东一人拍板决定，从来没有找过林彪商量，如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反路线”、全国全面夺权问题、三支两军问题、各地革委会的成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决策和执行，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林彪的身影。林彪秉承的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且林彪几乎从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也不参加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上当“甩手掌柜”。有关会议情况或者由叶群参加后回来汇报，或者听秘书转述文件精神。林彪的言行大都只涉及军队内部事务，如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后来发生的贺龙事件、“五一三事件”、“七二零事件”以及“杨余傅事件”等。林彪这种消极态度，毛泽东在文革初时就曾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并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毛泽东硬加在林彪头上的，中共十一届中全会是毛泽东把文革强加给全党全国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可林彪从一开始就不想参加，一再推托，请了病假，躲在大连疗养，从心底里就没有什么热情。此后成为副统帅的林彪变得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再难像建国之后那样事事置身事外了。以林彪的精明，林彪不可能认识不到文革的责任问题，甚至历史的评价。林彪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但是，林彪还说过，毛主席要负一万分的责任，我们只负一分责任。这说明林彪对毛泽东与文革有特殊的认识，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消极、不作为的主要原因。然而，在邓小平“利用论”的解释下，真正被毛利用的江青和林彪为文革负了一万分的责任，而毛本人却只负一分“被利用”的责任。对历史的荒谬解释莫此为甚。

笔者十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对比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国内宣传机器在评论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时常常引用周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官史的解读是：周恩来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周恩来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

替的作用。历史的真实恰恰是，周恩来真心拥护毛泽东，拥护毛的文革路线，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和有力的执行者。按照官方对历史的解读，周恩来在文革中积极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运动，做的大量工作都是“违心的、痛苦的选择”，是可以得到理解和原谅的，而林彪的消极和不作为却要归结为个人野心要篡党夺权，这里面的诡谲相信人们是能看得出来的。对比周恩来和林彪身后的评价与地位，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就是在用两种不同的政治标准解释和评判历史人物与事件。

七. 毛泽东为何要打到林彪？

林彪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早在江西苏区的战争年代即已形成，林彪在那时就是毛泽东的最早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在红四军与朱德、陈毅发生矛盾冲突时，林彪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嫡系和坚定的政治盟友，为毛泽东取得党权和军权的领导地位出了大力，而且林彪对毛的支持从未发生过动摇和变化。文革爆发后，随着刘邓的倒台，朱德、陈云的靠边站，林彪顺理成章地成为毛的接班人。以林对毛的一贯支持，毛为何在庐山会议之后非要置林于死地？

第一，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张春桥的发难使得毛异常警觉。林彪平时不表态，不显山不露水，从未提出过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或方针政策，而是唯毛是从，实行的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可是关键时刻林彪却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中坚力量，是毛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衣钵传人，在没有毛泽东授权允许之前，林彪就敢于出手收拾张春桥。一旦毛撒手归天，文革极左派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毛倾全力打造的文化大革命也必将彻底消亡。

第二，毛泽东通过庐山会议发现，中共整个老干部群体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绪和不满，林彪对张春桥一个隐晦的批评讲话就能引发老干部群体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声讨巨浪。个别小人物对文革不满不会引发整体时局的动荡与变化，但是中共的副统帅、毛的

接班人林彪对文革不满对毛而言则是天大的事件。毛泽东不会反思自己文革路线的荒谬，从而改弦更张，而是惯性思维将斗争的目光转向党内，挖出所谓的“主要矛盾”。由此，毛认为老干部群体对文革不满的情绪的根子在林彪这里，林彪触动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中共原来的一批元老已经被毛泽东打散，手中没有了权力，惟林彪却大权在握，又有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名分，所以毛在有生之年必须解决林彪问题。

第三，军队是毛泽东从事党内斗争的最后的终极手段。毛之所以屡屡在党内斗争中得手全都得益于军队的支持，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整垮高饶到整垮彭德怀，再到毛发动文革整垮刘少奇和邓小平，无不是有军队作为他的坚强后盾。所以，毛在党争中一向有恃无恐。文革以来，军方与文革极左派们时常发生矛盾，有时斗争还相当激烈，如“二月逆流”、《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和军队对群众组织的镇压。尤其是军委办事组与江青、张春桥文革极左派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毛对此也心知肚明。毛在世时不太担心军队的忠诚，但是一旦毛不在了，军心难免生变，如果此时仍是林彪掌握军权，毛怎能不担心他的文革大业？军权只有掌握在文革极左派手里毛才会放心。所以毛处心积虑换下林彪，再大力扶植文革极左派王洪文、张春桥们这些人掌控军权。这恰恰是林彪事件后毛所采取的措施和实施的行动。

毛泽东为拿下林彪所使用的手段：通过南巡给林彪戴上“篡党夺权”的谋反的帽子。林彪其他两项罪名“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是林彪事件之后“挖掘”出来的，那实际上只是涉及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林彪本人无关。所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给林彪量身定做的最原始和最严重的罪名是“谋逆”，即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毛在南巡中如是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指控林彪的这一“谋反”罪名足以置林于死地。

笔者相信毛在南巡前一定为林彪设想了多种罪名，但是以往对付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手段很难用在林彪的身上。历史上，林彪自参加革命后一向奋战在军事第一线，从未被俘被捕，没有“叛徒”“自首”的小辫子可抓；中共建国后林彪也未在中央一线工作过，

没有领导过国家的经济建设，没有自己的路线、方针或政策，无法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林彪主抓的军事领域，如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防战备及国防建设等均卓有成效，亦难以作为毛发难的缘由。与此同时，林彪一贯高举毛的旗帜，对制造毛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林彪宣扬了天才论就是反党反毛实在过于荒谬。因此，罪名轻了，很难动员全党向林发难，亦难以向全国人民解释为何拿下林彪。那么惟有说林彪有“反骨”，想当国家主席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如此这般才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设法拿下林彪。

事实上，所谓“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过是林彪事件之后才被突出彰显起来的，成为毛泽东一根打人的棍子。毛泽东南巡时有没有拿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篡党夺权”的证据？不要说毛当时就没有这样的证据，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拿不出任何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篡党夺权”的证据。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回避了当年毛给林定罪的最原始指控，而将重点放在林立果从事的活动上，再将林立果与林彪挂钩，圆了林彪集团“政变杀毛”的完整剧情，也圆了几十年来中共定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宣传。

八. 一封未曾发出的信：林对毛寄予的最后希望

前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其回忆里提及，林彪曾在1971年5月23日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件，虽然这封信并未送到毛的手中，但却反映了林彪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值得认真研究。

林彪在给毛的这封信里提出了以下四点：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

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在1971年4月29日结束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军委办事组作了政治结论，即军委办事组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是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这之前与黄吴李邱等人谈话中也表示到此为止，意味着庐山会议斗争告一段落。但是以林彪对毛为人和性格的了解，林彪并不想当然地认为毛会如此轻松地放过自己一马，林彪有必要再做些工作，进一步在组织上予以落实。

林彪提出的第一点实际涉及到军委办事组的政治前途，即对所谓“犯错误的人”要以党内思想批判的方式予以解决，而非撤职、逮捕、关押，甚至整死。中共党内以往的政治斗争大都是血腥和残酷的，被整之人无不身陷囹圄，乃至株连九族，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鉴于此，林彪特别提出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应实行思想斗争，而非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个想法或提议在中共历史上也是极为罕有的。其实，扩大来看，这一提法也包括了林彪自己。毛泽东和中共如能贯彻实行这一政策，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尽管林彪提到的所谓“犯错误的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错误的判定者又何尝不是错误的根源和制造者？

林彪提出的第二点实质上是对自身的限制。它的要害是，只有毛泽东有权下令抓人、关人、杀人，其他人均无这种权力，包括林彪自己。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们并不掌握军权，他们根本无权下令抓人、关人或杀人。当时只有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掌握了军队的

权力，是有可能利用军队实施强制措施的。但是没有毛的命令，无论是林彪还是军委办事组都不能动用军队达到自己的目的。林彪提出这一点等于明确向毛表白，林彪自己是没有野心的，绝不会利用军队造反作乱。

林彪提出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更是明确向毛表示自己大公无私、襟怀坦白，尤其是提议将有原四野背景的38军调离京畿地区，换为其他野战军的部队，彻底表明林彪绝不可能利用军队与毛作对，直接向毛输诚表忠，以换取毛对林彪的放心和安心。

林彪这封信的出发点显然是希望毛能够放过自己一马。可惜的是这仅仅是林的一厢情愿，毛泽东岂是这么好相与的？在毛泽东看来，开弓没有回头箭，林彪不愿公开作检讨，毛泽东手里没有林彪低头认错（罪）的把柄，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解决林彪问题？纵观中共历史，所有下台的领导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做出“深刻”检讨，认罪悔过，这是毛泽东的政治规矩，岂能因为林彪一人而废？周恩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延安整风起到文革后期这三十多年里，周恩来人前人后不知做过多少次沉痛检讨，连中央文革的大将王力都听烦了，可是周依然检讨不断，周恩来如此不厌其烦的检讨不就是时时刻刻向毛输诚表忠？所以，周恩来对问题的实质看得更加透彻，对林彪的这封信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说穿了就是林彪这番表白不会起什么作用，还不如老老实实向毛作检讨求得过关，也许还能得到文革中邓小平式的待遇，不至于走到刘少奇那般下场。

九. 林彪的出走：与毛和平分手，不跟你玩了

林彪在北戴河最后的日子呈现出极为消极的状态。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至少通过两个渠道传到了北戴河林彪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叶群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但是林彪却是消极以待，甚至对身边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啦”云云。这与毛泽东精神抖擞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林彪要从事一场针对毛泽东的政变，最主要的准备和行动就是要招兵买马，运筹

帷幄，不仅在自己的人马里精挑细选，还要上串下连，从各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如兵源、枪支、弹药、后勤、善后、舆论宣传等等。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就是如此多方面做好了宫廷政变的准备，从而做到了以快打慢，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林彪在北戴河有任何这方面的举措，林彪如此之行为又谈何发动政变实施杀毛大计呢？

我们再看毛泽东的南巡。毛一路精神亢奋，走一路说一路，密集召集各地党政大员，反复向他们宣讲党内出现的多次路线斗争，强调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暗示或明示党内依然有两个司令部，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等等，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彪。毛甚至动员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向林彪发难。毛南巡的目的就是要警示军政大员们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在关键时刻向林彪发起进攻。所以，与其说林彪要搞政变杀毛，还不如说毛泽东为林彪量身定做了“谋反”的罪名，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政变手段，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这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布置周恩来、叶剑英成立首都工作组，秘密在北京调兵遣将，扩充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所谓的“防修正主义政变”，有异曲同工之妙。

林彪所乘的三叉戟飞机在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飞离山海关机场，先向广州方向，后转向北京方向，最终往北向蒙古国飞去。林彪专机在凌晨1点50分左右飞越中蒙边境，2点30分左右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

林彪为何在仓皇之中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这一直是世人和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几位当事人的说法，林彪、叶群都曾说过要去大连，亦曾商量过去广州，而且去大连也是林彪一行临动身时的目的地。笔者认为，林立果和叶群在知悉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内容后，深知毛下一步的整肃步骤一定会接踵而至，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一走了之。但是逃到哪里才安全恐怕也还没有完全想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要逃亡就必须有林彪的首肯。对林彪而言，不管逃到中国哪个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大连、广州与北戴河没有任何区别，唯有逃到国外方保无虞。然而这恐怕也是最难说服林彪之处。笔者推测，在说服林彪离开北戴

河问题上，叶群和林立果的立场是一致的，只要林彪上了飞机，飞机掌握在林立果的手上，到时候林彪也不得不承认飞到国外的既成事实。

林彪一行人早已作古，我们无法确知林彪在最后出走时的真实想法。但是，我相信，当那架三叉戟飞机腾空而起时，林彪是以自己的行动与毛泽东和平分手了，林彪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林彪心里应该清楚，如果自己还留在北戴河，毛泽东的下一步必是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标配的流程一定是揭发、批斗、检讨、撤职、关押、审查，林彪即使不趟刘少奇的覆辙，可能也会步贺龙的后尘，那么与其被毛泽东关在黑屋子里整死，还不如一走了之。用一句市井俚语：拜拜了您呐，不跟你毛泽东玩了。

十．林彪事件体现了毛泽东接班人体制的失败

林彪事件实际上折射出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失败。有台湾学者认为，毛泽东选择林彪当接班人并非真心实意，林彪仅仅是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只是一个用来过渡的幌子。但是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文革初起时的中共高层权力运作，即可知道毛泽东在那时选择林彪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毛外，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刘邓是毛在文革时首先要拿下的对象，朱德和陈云也靠边站，不管事，置身事外。有条件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但是周恩来从未被毛考虑过接班人的可能性。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是毛的唯一人选。更何况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支持毛泽东，被誉为“亲密战友”。可以说，毛选择了林彪是一种必然，无论从能力、地位、还是功劳上看林彪都是毛的一时之选。至于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不满要拿下林彪，也是毛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毛后来废黜林彪而认为毛一开始就是玩欺骗。毛要利用林时 can 提拔其到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嫌弃不用时也可将其一手打倒摧毁，正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这不过就是中国历代皇权专制社会的现代翻版而已。

毛泽东一生雄才大略，曾以诗言志，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统治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成吉思汗均不在毛的话下，毛自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不仅要打倒刘少奇拿回手中的权力，毛更要追求“敢教日月换新天”，要重新锻造人们的灵魂，创造一个崭新的人类世界，实现一个乌托邦式的“太平天国”。为了这个目标，毛不惜天下震荡、生灵涂炭。为了这一目标，毛千辛万苦、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宏伟蓝图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就要选择一位合适的接班人。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一直换到自己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然而，历史却开了毛一个大玩笑，毛生前选定的接班人不是被他自己整垮、整死，就是在毛死后被抓，最后一个接班人华国锋干脆彻底背叛了毛，把毛的妻子和亲信们通通送进了秦城监狱。

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比一个“短寿”，刘少奇从1943年延安整风崛起到文革被打倒凡23年；林彪从文革初被誉为“亲密战友”、副统帅、接班人，甚至还将名分写入中共九大的党章，到1971年却被逼逃亡死于蒙古荒漠，才仅仅5年；王洪文在文革中被毛“慧眼识珠”，从上海一个造反派领袖火箭式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到被毛冷落只有2年的光景；邓小平在1975年初被毛赋予极大的权力，接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好景不长，邓很快就被毛怀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976年初被毛赶下了台，从邓第三次上台到下台也就一年光景；毛泽东在临死前几个月匆忙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但不旋踵在毛死后却叛毛而去。

可以说，毛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刘少奇与林彪的倒台主要源于与毛治国理念的矛盾和冲突；王洪文则是自己浅薄、无能，毛过高估计了王的能力，属于朽木不可雕，毛硬赶鸭子上架，结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邓小平的下台纯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毛原本寄望华国锋能够在中央平衡左右两派的矛盾，维持毛继续革命的文革路线，但是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华国锋自己也好景不长，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三下两下就被邓小平赶下了台。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毛泽东聪明一世，永远是他算计别人，惟毛的最大恶行之一是将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党内领导人动辄冠以“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或整倒整

死，而毛的这些聪明反被聪明误。毛万万没有想到是，他一生搞运动，以运动治国，他最后十年的文革运动登峰造极，纯属祸国殃民，罪恶滔天，他的死亡就意味着他所发动的文革走到了尽头。中共党内除了“四人帮”等极少数人外，无人愿意继续毛的极左路线。这恰恰就是毛的愚蠢。毛也许预见到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但是终归不愿正视现实，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找好了接班人即可以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毛生前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套在毛自己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林彪的失败也是毛泽东接班人体制的失败。■

【史实辨析】

再谈林彪专机的“黑匣子”

蒋健

中国公众最早知晓在蒙古坠毁的林彪专机装有“黑匣子”是在1994年：前苏联的林彪三叉戟专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告诉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林彪专机的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¹扎格沃兹丁还说过：“三叉戟飞机几乎飞越蒙古，快到苏蒙边境时才突然掉头南飞并在随后坠毁。”

俄、蒙当事人的话不可尽信

不过，从扎格沃兹丁的上述说法来看，他既对三叉戟飞机的性能根本不了解，更对英国黑匣子的发展史完全无知。

首先，因为从林彪专机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到靠近蒙古的前苏联边境城市赤塔的距离约为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的飞机坠机现场有600多公里，减去“快到苏蒙边境”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比如飞机在距赤塔还有50公里左右时就折返，也就是说，飞机在越过中蒙国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而根据蒙古当年发布的《关于中国飞机失事》²的消息，三叉戟在9月13日1点55分越过中蒙边境，在2点25分坠毁，这意味着三叉戟的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600公里左右。然而，三叉戟1E型飞机在高空时的巡航速度在930到970公里/小时之间，但林彪专机在进入蒙古后，始终是低空飞行，因此它的实际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700-800公里。这也就是说，扎格沃兹丁把林彪专机的飞行速度夸大了三倍多。

¹ 李安定：《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

² 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二）——视察林彪机毁人亡现场和对外交涉》，《世界知识》，1988年2期，14页。

其次，黑匣子分飞行数据记录器（FDR）和舱音记录器（CVR）两部分。根据英国航空法，从1966年7月开始，客机只是必须安装FDR。在英国，客机是否要安装CVR则是六年以后才严肃讨论的事情。这意味着，如果克格勃真的在坠机现场找到了黑匣子，它只能是个FDR，而当时的FDR实际上就是一个航迹记录仪，那么，扎格沃兹丁就不该把林彪专机的飞行路线都说错。

实际上，不仅扎格沃兹丁是个外行，就是蒙古那个1971年10月正式组成的三叉戟坠毁事故调查委员会中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技术内行，所以其调查报告才会出现三叉戟飞机“航速为680公里/小时”¹这样的错误。

中国当事人对黑匣子以讹传讹

虽然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林彪专机的黑匣子找到了，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物证，而且俄罗斯官方对黑匣子一事从来没有给予回应过。

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的一些“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以讹传讹。

让中国公众广为认知林彪专机有黑匣子的人首推康庭梓。作为当年林彪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自1997年以笔名“广辛”²开始，通过《传记文学》、《文史精华》、《航空知识》等期刊以及个人回忆录³，还有一些电视采访节目，讲述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亲身经历，分析林彪专机坠毁的原因，并底气十足地反复提到黑匣子，比如，他说：“林彪座机256号的黑匣子中的事故记录器，是直径约15厘米的圆球状物体，象一个金属制造的小西瓜，安装在飞机尾部的垂直安定面内。”“256号的语音记录器是一个扁平的长方体，长约40厘米，宽7到8厘米，高约15厘米。它的位置在前驾驶舱领航员后面的无线

¹《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blog.sina.com.cn/s/blog_15e2c94500102wxpo.html

²广辛：《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传记文学》，1997年4期，17-29页。

³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

电设备专用架上，用手推进去后固定在架子上。语音记录器的传感器，位于前驾驶舱顶上，那里有一个带网状小窗口，里面安装着象送话器一样的设备。”¹

孙一先最先呼应了康庭梓的说法，他说：“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²

而“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担任专机师师长的时念堂的表态比康庭梓还进一步，他说：“根据我们以飞行专业的眼光判断，这些‘黑匣子’一定还保存在某个地方，不会随着256号三叉戟飞机的爆炸消失。”“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死了。死无对证。但是，‘黑匣子’还‘活’着，还‘活’在某一个地方，它还能说话。”³

孙一先后还表示：“三叉戟256号上的黑匣子，以及死难者的遗体 and 遗物，何时能够回到我国呢？我认为按照国际惯例，俄罗斯和蒙古当局这么无限期地扣押下去，是没有道理和法理根据的，我国应该在适当时机索要。”⁴

来自蒙古方面的后续材料进一步“坐实”黑匣子

日本共同社2006年9月13日发自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则电信说，该社日前获得就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一事，当时蒙古政府曾总结的一份调查报告。“共同社日前专访了前蒙古国家警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机关最高负责人参与林彪座机坠毁事件调查工作的奥索林·奥特恭捷格。他证实，当时苏联政府自始至终密切参与了事件的调查，进行了回收黑匣子等工作。”“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机上人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苏联；另一方则想返回中国。”⁵

¹康庭梓：《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256号黑匣子》，《文史精华》，2000年8期，18-19页。

²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08页。

³时念堂，孙焕英：《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民主与法制》，2005年3期。

⁴孙一先：《林彪坠机后，因何没找黑匣子？》，《文史博览》，2010年10期，16页。

⁵新华网：《日本共同社披露林彪坠机蒙方报告》，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15/content_5094624.htm

另据孙一先介绍，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达希达瓦在其《林彪元帅之死》一书中披露：1971年9月15日上午，一伙“苏联专家”乘米-8直升机从赤塔飞到坠机现场，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负责管理坠机现场的肯特省公安处长奥特根加尔格勒中校进行阻拦，认为“黑匣子不应当归苏方”，但是在场的蒙古国防部副部长陶赫同意苏联人拿走。¹

随后，舒云爆料了《林彪元帅之死》中关于黑匣子的更多细节：“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²

王海光也曾表示：“来自蒙方的材料，最有价值的是达西达瓦2007年写的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作者曾担任过蒙古档案馆馆长，根据他所掌握的蒙方资料，又参考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写成了该书。书中有大量蒙方拍的现场照片，对现场登记的物品有较详细的记载，证实了是苏联人取走了黑匣子。”³

据说“被中国要回来”的黑匣子与被说“回国”的林彪

前苏联（俄罗斯）的扎格沃兹丁——中国的康庭梓、孙一先和时念堂——蒙古的奥索林·奥特恭捷格等当事人，他们的说法貌似构成一条坚实的证据链。

东西在就好，何况最近20年中俄关系一直良好，看起来中国是有可能要回黑匣子的。

果不其然，舒云于2011年3月15日“独家披露和猜测”：

“我非常关心林彪飞机黑匣子，曾建议能搞到大量苏联档案的朋友想办法。朋友说有研究者向俄国要过，但俄国没给。2010年底有朋友在公开场合说林彪事件黑匣子被中国要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几个月过去，朋友私下告诉我，至今健在的某中共元老2008年在

¹孙一先：《林彪坠机后，因何没找黑匣子？》，《文史博览》，2010年10期，16页。

²舒云：《蒙古学者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细节》，《文史参考》，2011年17期。

³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www.cssm.org.cn/view.php?id=32859

中南海听了林彪事件黑匣子，里面有林彪的声音。我赶快问说了什么，朋友说林彪说‘回来’。我顺着线索往前追，从另一位朋友那里，我又得到一个信息，说黑匣子里林彪说‘回国’。”“朋友说：如果公布黑匣子的内容，林彪叛国就将改写！我还是问号多多，但是又极力说服自己相信。”“蒙古人公布苏联拿走黑匣子，这是没有疑义的。奇怪的是苏联不仅没有公布黑匣子的内容，甚至连林彪事件黑匣子被他们拿走了的事实都从来没有承认过。”“从汉纳姆的文章中，我们还看到他提了一句黑匣子，说黑匣子里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这话没有错，林彪飞机始终没有与地面联系。但是机内通话的声音有没有呢？汉纳姆的文章没有说。”“根据中俄目前的友好关系，我相信，如果中国开口要林彪事件黑匣子，俄国没有任何理由不给。再如果，中国要回林彪事件黑匣子，里面有林彪‘回国’的声音，就应该尽快重审林彪案，别再拖了。”¹

在舒云“独家披露和猜测”黑匣子的半年后，原中新社记者高瑜在报道北京2011年9月4日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时提到，“据说飞机的黑匣子已经送还中国，据万里长子万伯翱讲，可以听到林彪说：‘回去。’后来又有知情人纠正，林彪说的是：‘回家。’”但涉事人万伯翱很快就公开辟谣，他说此前林豆豆也问过他，他明确回复，他不知道。万伯翱声明，他不知道林彪专机黑匣子，更不可能听见黑匣子里面说什么“回家”；他父亲万里也不知道黑匣子。²

原来是一场乌龙！

世人为什么关注林彪专机的黑匣子？

如果黑匣子内的信息真能面世，那么，起码会像康庭梓说的那样，人们“从语音黑匣子中的对话能知道每个人对飞机所处状态的态度，从飞机尾部的事故记录器中可以分析出

¹舒云：《林彪飞机黑匣子被中国要回来了？》，blog.sina.com.cn/s/blog_4447da480100puu9.html

²《万伯翱声明：他没有说林彪事件黑匣子回来了》，blog.sina.com.cn/s/blog_4447da480102dsnd.html

飞机的飞行状态及其产生的原因，如果在空中突然停车与擦地后爆炸停车，记录器中都会有明确的记录。”¹

不过，有些人认为黑匣子虽然有用，但对彻底搞清“九一三事件”不会有太大帮助，比如，王海光就说过：“即使‘黑匣子’解密了，这半个小时的机舱录音又能说明多少问题？”²

当然，更有一些人对黑匣子内的信息寄予莫大期望，比如，林豆豆就认为：“如果它公诸于世，则‘九·一三事件’之迷，将会大白天下。”³

然而，愿望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三叉戟飞机上真的有黑匣子吗？

中国大陆最早独立地调查、研究“九一三事件”的张聂尔女士在谈到林彪一行九人生命的最后时光时感慨：“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一切。这一切将永远无从知晓。飞机上没有黑匣子，黑匣子是后来才有的……”⁴

笔者（网名 jhealth）曾经在强国军事纵横论坛上问张聂尔（即该论坛区长白马博士）：你如何看待扎格沃兹丁和康庭梓关于黑匣子的说法？张聂尔答说她在写《风云九·一三》期间看过汉纳姆的报道，后来也看过康庭梓的文章，但她采访过的空军专机师的人都说他们那里飞机上的黑匣子是后来才装上的。

当时，笔者还根据自己从事科研的经历，在强国军事纵横论坛说过：黑匣子有两种，一种叫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种是机舱声音记录仪。1960年代的英国飞机只装了飞行数据记录仪，机舱声音记录仪是1970年代以后才加装的。林彪的三叉戟专机肯定没装机舱声音记录仪。

¹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220页

²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战略与管理》，2013年2期，www.cssm.org.cn/view.php?id=32860

³李衡：《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天安门》，1998年8月

⁴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293页

就笔者管见所及，另一个质疑林彪三叉戟专机有黑匣子的人是强国军事纵横论坛网友京城孤魂。京城孤魂最初既相信了孙一先关于“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三叉戟一台发动机”的说法，也相信了扎格沃兹丁关于克格勃找到了三叉戟黑匣子的说法。¹但他后来将他搜集到的“九一三事件”多年之后发生的两起三叉戟飞机事故的调查报告陆续发在强国军事纵横论坛上，并发声改变观点，认为林彪的三叉戟专机不一定装了黑匣子；他还根据美国间谍卫星1971年9月21日拍摄的林彪专机坠机现场照片，认为孙一先，实际上是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关于“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的说法是不靠谱的。京城孤魂最终的结论是：苏联人没有偷走过林彪三叉戟专机的发动机，该专机没有装黑匣子。²

但是，在当今世界，凡是新闻在报道飞机失事的消息时，自然而然地会提到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是否找到，这就给关心“九一三事件”的人一种感觉：坠毁的林彪专机上也应该有黑匣子。他们通常会进而追问：这黑匣子去哪儿了？

而当事人康庭梓的说法更使关心“九一三事件”的人，包括专业研究人士，对林彪专机有黑匣子的说法深信不疑，比如，林豆豆说过：“有位没有来得及登机的副驾驶，他叫康廷（庭）梓，他的证言较为确实。这架三叉戟飞机是他从广州接来的。他一直在这个机组，熟悉飞机的性能和机上的设施。他谈了不少秘而未宣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飞机上的黑匣子至今未找到**。它的录音只有厂家——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能解密。不知苏联克格勃为什么至今不肯交出来？也许他们自行其事给弄坏了；也许他们在等待某个政治气候……”³又如，王海光认为：“林彪256号专机副驾驶员康庭梓，从1997年起撰写了多篇文章，叙述他在山海关机场经历的林彪仓皇出逃的情况、飞机起飞前的机组情况，并依据他的专业知识和飞行经验对256号专机的飞行和坠落情况提出了专业性分析意见，**最早**

¹京城孤魂：《谁干掉了“256”专机》，《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05年1月17日

²京城孤魂：《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二），《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13年9月8日

³李衡：《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天安门》，1998年8月

提出了飞机‘黑匣子’等问题。这些文章具有见证人和技术专家的双重优势，对研究者很有帮助。”¹

相形之下，长期以来，反倒是那些认为林彪专机没有黑匣子的观点收到了质疑，比如，曾任《中国空军》杂志主编的张聿温对张聂尔关于林彪所乘“飞机上没有黑匣子，黑匣子是后来才有的”说法的评论是：“这不对。”而张聿温做出如此评论的依据无非就是笔者在前面提到的扎格沃兹丁、孙一先、康庭梓的那些说法。²

笔者缘何关注林彪专机黑匣子的传闻？

康庭梓说过：“当时 256 号三叉戟机组人员为什么有走有留？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后为什么会形成很不正常的大转弯？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从飞机黑匣子里知道些什么信息？……”“离开飞机，离开专机，离开飞行专业知识，上述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还有，即使是飞行专业的内行，如果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事件，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亲身体会，也不会去写。”³

应该说，康庭梓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关于“九一三事件”这个话题之所以说不透，除了国内政治上的限制之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关心“九一三事件”的人普遍不懂飞机专业知识、而懂得飞机专业知识的人又普遍不关心这事等问题。总之，要搞清“林彪专机黑匣子”的事光凭八卦是不行的，必须要具备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笔者对“九一三事件”以及林彪专机黑匣子传闻的关注是和笔者的个人经历有关的：

笔者的一个“发小”的父亲吕增辉在黄永胜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被调到黄身边做秘书。据当时在北空干部部工作的笔者父亲说，黄永胜对其秘书的候选人提了三个条件：一是打过仗，二是文笔好，三是熟悉机关工作。经过千挑万选，时任北空宣传部副部长的吕增辉得以赴任，并成了黄永胜办公室的党支部书记。吕家 1970 年搬到总参宿舍区后，我

¹王海光：《30 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www.cssm.org.cn/view.php?id=32859

²张聿温：《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313-314 页

³康庭梓：《难忘“九一三”》，《党史博览》，2014 年 1 期，36-37 页

家就搬进腾空了的吕家那个单元房去住。1971年夏的某个星期日，吕叔叔带着儿女，坐着黄永胜的大红旗车，回到阔别了一年的北空访旧，他儿子送了我两个芒果，因为1968年8月毛泽东将外宾敬献给他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的缘故，那时的芒果堪称圣果！没想到，不久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下子从战神变成了国贼！接下来的传言骇人听闻：吕增辉夏天那次回到北空有可能是为黄永胜搞政变拉队伍！于是排查当时被吕接触过的人，于是我父亲也被问到吕增辉是否送了他两个芒果？于是笔者也被核实到那两个芒果到底是大人送大人的，还是小孩送小孩的？……当然，所谓吕增辉为政变而来纯属子虚乌有，最终北空的人并没有被吕牵连。不过，吕增辉本人的命运则受到黄永胜的牵连，与很多人一起被安排在北京团河农场接受审查。四年后，审查结束，吕增辉被打发回北空重新安排工作，但上面要求对吕：一不能留在北京，二不能去要害单位，三不能担任一把手。于是，再次经过千挑万选，吕增辉被安排在位于河北获鹿县的空军468医院任第二政委。笔者1977年2月去空军21厂接受机务教导队的培训时，曾经去相邻的468医院看过，真的是一个荒凉所在。笔者不禁感叹：吕叔叔一家人的命运真的是被“九一三事件”改变了。

至于黑匣子，从笔者的个人经历来看，1971年的中国飞机不可能装有黑匣子，因为笔者从1977年1月开始在一家空军的飞机修理厂（营级单位）工作，那时的机务人员根本没有黑匣子的概念，记得1979年3月，空军专机师的一架三叉戟飞机被一名泄私愤的机械员偷开上天并在京西酿成一起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但在事后事故通报中并没有提到黑匣子。直到1983年8月底，笔者才彻底离开这家修理厂，因为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规定凡是考上地方院校研究生的军人一律退出现役，在走的时候，笔者脑子里仍然没有黑匣子的概念。

笔者第一次听说黑匣子以及林彪专机有黑匣子的传言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笔者是1985年夏第一次乘坐民航客机的，那时常为一个科研项目去南京，有一次在南京有线电厂的招待所里遇到一个广空的子弟兼广空的地勤转业干部，闲聊时我说起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一个是贵，从北京飞到南京要74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56元）；另一个是快，

飞机上天后，我就和同行的师兄商量着是否要去看看波音-737的厕所是什么样的？可商量的结果还没出来，南京就到了！因为都是空军子弟，又都在空军当过兵，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九一三事件”，那位老兄说，林彪的三叉戟飞机装了不怕摔的记录飞行数据的黑匣子，机舱还装了能录音的黑匣子。笔者当时质疑说，可咱们当兵那会儿可没有听说过有黑匣子啊！那位老兄答，咱们维护的是战斗机或者教练机，当然没有啦，而进口的三叉戟客机、波音客机肯定是装了黑匣子的，那东西是免维护的。这次闲聊给笔者留下了很深印象，而且使笔者一度确信林彪专机是有黑匣子的。现在看起来，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类传言是和中国已经有了飞机要装黑匣子的规定、而且飞机黑匣子及其知识也已经在中国逐渐普及有很大关系，比如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1986 年夏就对人谈过林彪专机的黑匣子：“传说很多，黑匣子是烧不坏的，可能被搞到苏联去了，据说里面的录音还有开枪的声音，争吵，因为里面并不都是他的死党。这是传说，没准儿。”¹

1987 年底，一个在航空工业部分管项目开发的熟人，向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介绍了部里几个计划上的新项目，其中一个就是国产的飞机黑匣子的研发。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的英美科技文献，包括去中国专利局（当时在海淀区西八里庄的一片平房内）复印了许多黑匣子专利说明书。在一篇关于英国黑匣子发展史的综述²中，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些史实：

1972 年 6 月在英国斯泰恩斯坠毁的一架三叉戟客机上没有装 CVR；随后的事故调查表明，虽然 FDR 信息有相当价值，但调查人员如果能确定机组成员之间通过命令、评论或惊叫所传递的信息，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个清晰得多的导致坠毁事故的事件系列的场景；这起空难以及随后的调查报告帮助英国通过了飞机安装 CVR 的法令；1972 年修改通过的英国航空法并不要求三叉戟等已经定型的现有客机加装 CVR。³

¹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 年 1 期，25 页

²Terence E. Ford: "Flight Recording in the UK: 1. Evolution",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52 Iss: 3 pp. 6-8, March 1980; "Flight Recording in the UK: 2. Equipment",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52 Iss: 4 pp. 5-8, April 1980

³"Flight Recording in the UK: 1. Evolution",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52 Iss: 3 p.7, March 1980

这些史实使笔者从此确信关于林彪三叉戟专机装了 CVR 黑匣子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过，因为笔者当时没查后来被作为林彪专机的那架三叉戟是何时被巴基斯坦订货的，也没查那架三叉戟是何时被英国交货的，所以不敢确定那架三叉戟是否装了 FDR 黑匣子，毕竟笔者当时的兴趣和注意力是放在黑匣子的工作原理、设计难点以及本课题组承担黑匣子研发的可行性等方面。事实也是因为加工和测试的条件不具备，我们没有试图去做这个黑匣子项目，而是选择了一个在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进行的项目，笔者为此与该所的有关科室进行了持续六年的合作研究¹。

随着互联网论坛在上个世纪末的兴起，笔者收拾起少年时的情趣，开始了对党史和军史的潜心研究，陆续结识了京城孤魂、丁凯文、白马博士、zhhkcy1、danbe、马甲同志、李梓铭、工蜂、三尺晴天等精通党史和/或军史的网络达人。尤其是在军事强国纵横论坛上对“九一三事件”的长期讨论，由于有许多各个层面的当事人或其子女的参与，使得笔者对“九一三事件”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此笔者从 2007 年，也就是林彪诞辰百年那年，有了写一本全面回顾“九一三事件”专著的想法，并开始全方位收集、整理资料。2011 年春，在收到《记忆》为纪念“九一三事件”发生 40 周年的征稿函后，笔者开始动笔，随后在《记忆》上或在《记忆》的帮助下，把部分章节发了出来。²

至于林彪专机的黑匣子问题，笔者认为它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和结果都无关，它只是围绕着“九一三事件”的一个讹传而已，但因为它在圈内外传得沸沸扬扬，所以笔者也打算写篇澄清文章，毕竟对笔者来说，查阅英国三叉戟飞机和黑匣子方面的英文资料可说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反倒是在国内发表并不涉及政治是否正确的相关文章时遇到了

¹蒋健：《热压罐微机控制系统的控制算法和软件设计》，《自动化与仪表》，1995 年 3 期，28-31 页；蒋健：《一类不确定性系统的多目标智能控制》，《控制理论与应用》，1996 年 1 期，52-57 页

²蒋健：《回望“九一三”》（一），《记忆》78 期，20-85 页；蒋健：《林彪卷入“两谋”有多深？》，引自启之、何蜀编《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2 年，363-391 页；蒋健：《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记忆》101 期，15-22 页；蒋健：《<“571 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记忆》113 期，43-59 页

麻烦：先后有两家纸媒允诺发表拙作，但后来都没了消息。一路坎坷，直到2014年，笔者的“黑匣子”之作才得见天日。¹

康庭梓对笔者说法的反驳

2015年12月初，笔者获悉著名文革史学家余汝信收集到蒙古官方调查委员会当年完成的《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余先生还在请人将该报告全文翻译成中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解读。

果不其然，该报告只字未涉黑匣子，这表明日本共同社2006年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那则报道中关于黑匣子的叙述纯属生编硬造，同时也表明康庭梓依托那篇日本报道中的黑匣子所作的种种猜测十分滑稽。

在同余汝信先生交流后，笔者感到纸媒、小众电子杂志的传播力着实有限，于是将先前所发文章稍加修改后发在了传播影响力颇大的共识网上，没想到的是，该文迅速被《今日头条》网站转载²，足见今日社会对“林彪事件”仍然有很高的关注度。

不久，笔者在舒云博客上看到了康庭梓的反驳：

康庭梓认为蒋文不能证明256号三叉戟专机没有黑匣子。蒋健的证据是中国没人看见过黑匣子，“俄罗斯官方对黑匣子一事从来没有给予回应过”，这难道就能证明林彪专机没有黑匣子吗？显然不能。蒋健说：“这些直接从英国买进的三叉戟客机直到1980年代才装上黑匣子。因为1982年空军司令部司科字第45号文件‘飞行参数记录系统主要战术技术要求’中明确规定‘1985年后，我国所有飞机都要装飞行数据记录仪’，所以我国民航才在1983年引进了77套美国S·D·C公司生产的UFDR飞行数据记录仪，装在三叉戟、安-24和伊尔18三种飞机上。”原空军34师装备部部长梁金海说：“1983年集体装的‘飞行数据记录仪’，是检查飞行员飞行情况的，不是‘飞行数据记录器’，即黑匣子。”康庭梓

¹蒋健：《林彪座机上有黑匣子吗》，《文史精华》，2014年1期，66-71页；蒋健：《历史不忍细究——揭开“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记忆》119期，48-57页

²《蒋健：林彪专机黑匣子之谜破解》，toutiao.com/a6236474755408396545/

说：“空军从来没有集体装过黑匣子。”蒋健以1983年安装检查飞行员飞行状态的“记录仪”，来证明英国公司80年代的三叉戟上没有黑匣子，是完全没有证明力的。¹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笔者从来没有说过“英国公司80年代的三叉戟上没有黑匣子”之类的话，笔者说的是，“我国在1972年到1975年期间，从英国直接订购了35架比‘三叉戟1E’更先进的‘三叉戟2E’和‘三叉戟超3B’客机，但它们都没有装配黑匣子……。这些直接从英国买进的三叉戟客机直到1980年代才装上黑匣子。”²

256号那批三叉戟飞机没装黑匣子的三重“人证”

笔者之所以说“中国没人看见过黑匣子”，进而说256号那批三叉戟飞机没装黑匣子，除了“舶来品”（英文文献）之外，还基于出自本土的以下三个信息来源：

第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张聂尔的《风云“九一三”》一书，她依据她的采访，明确说“黑匣子是后来才有的”。

第二个是原空军司令员王海的回忆。时任空司军训部部长的王海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大约十天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分析研究。”“当时，与256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笔者注：应为三架），在进行失事原因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³

¹舒云：《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廷梓谈黑匣子》，blog.sina.com.cn/s/blog_4447da480102w1zt.html

²蒋健：《林彪专机黑匣子之谜破解》，www.21ccom.net/html/2016/xiandai_0106/404_3.html

³王海：《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事件》，湖南文史，2001年4期，42-43页

需要注意的是，王海调查组的工作持续了七个多月，而且调查组的成员决非像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这种菜鸟，绝大部分都是懂得飞机和/或飞行的空军精英，倘若三叉戟飞机真的配备了黑匣子，他们决不会不发现飞机上的黑匣子；倘若发现了，他们也决不会在事故报告中只字不提黑匣子。否则，“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这句话就是十足的妄言。这就表明那批三叉戟飞机根本就没装黑匣子！

第三个就是康庭梓本人的“证词”。这听起来颇具反讽意味，事实上，康庭梓本人是那批三叉戟飞机没装黑匣子的最佳“人证”。从康庭梓的回忆来看，他至少飞过 252 号和 256 号这两架三叉戟飞机；同时，他承认他自己并没有见过三叉戟飞机上的黑匣子，他的原话是：“256 号专机黑匣子的工作情况是否良好，起码失去了空勤组人员的监督。就我本人在飞三叉戟飞机的日子里，从没有主动地向地勤保障人员询问过黑匣子的工作情况，连想看一看黑匣子外观的好奇心都没有”¹。按照康庭梓的理解，“黑匣子不像飞机的发动机那样，只要飞行，就得当天检查”，“黑匣子的暂时故障，也不会影响到飞行安全，这一点对负责维护它的地勤人员来说，也是容易在思想上产生麻痹的原因所在”，“在平时的飞行中，黑匣子就像办公大楼走廊尽头墙上挂的灭火器一样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久而久之，黑匣子成了飞行员头脑中被遗忘的角落。就像大楼失火时才想到灭火器一样，一旦飞机失事后，寻找原因时才会想到黑匣子。”²这表明康庭梓根本不了解当时英制黑匣子的性能、维护和操作方法以及英国航空法的相关规定，比如，每次飞行时，空勤人员至少得向飞行数据记录系统输入航班号和实际起飞时间的数据，这意味着黑匣子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在空勤组人员的视线之外，康庭梓没见过黑匣子系统是因为中国从巴基斯坦买入的那批三叉戟飞机根本就没装黑匣子系统！

¹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260-261 页

²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260-261 页

笔者的说法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

至于康庭梓指斥的“蒋健说：这些直接从英国买进的三叉戟客机直到1980年代才装上黑匣子。因为1982年空军司令部司科字第45号文件‘飞行参数记录系统主要战术技术要求’中明确规定‘1985年后，我国所有飞机都要装飞行数据记录仪’，所以我国民航才在1983年引进了77套美国S·D·C公司生产的UFDR飞行数据记录仪，装在三叉戟、安-24和伊尔18三种飞机上”这段话并非笔者原创，只是笔者对刘军仓先生发表在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主办的专业期刊《国外试飞》上的一篇专业文章的辑引¹，而且发在《记忆》上的拙文用脚注的形式提到了该文献²，如果说笔者有所改动的话，也就是将原文中的“美国S、D、C公司”改成“美国S·D·C公司”，因为笔者觉得英文中没有“、”这个符号，很可能是排版人员把作者手写的符号看错了，毕竟那时用电脑写作还不普遍。

刘军仓先生就在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工作，从他1993-1995年发表的《飞行数据记录仪》等五篇文章³来看，他对各国飞机黑匣子的发展史以及相关技术和设备很有研究。

至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它是我国唯一经国家授权的军民用飞机、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等航空产品国家级鉴定试飞机构，是国家级的飞行试验技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国家“飞机适航认可实验室”。⁴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哪国的设备，如果想在中国上天的话，首先要获得该院的认可并获颁“适航证”，即俗称的“上天证”。

从刘军仓的工作性质以及他供职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属性来看，笔者认为他关于我国民航在1983年引进77套美国产的飞行数据记录仪并装在三叉戟等飞机上的说法是可信的，毕竟这些设备在上中国飞机之前要先获得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适航证”。

至于康庭梓提到的原空军34师装备部部长梁金海，从他的工作性质看，就是个用户而

¹刘军仓：《飞行数据记录仪》，《国外试飞》，1995年2期，24页

²蒋健：《历史不忍细究——揭开“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记忆》119期，53页

³刘军仓：《飞行数据记录仪》，《国外试飞》，1995年2期，24-29页；刘军仓：《利用飞行数据记录器分析和预防飞行事故》，《国外试飞》，1993年3期，5-10页；刘军仓：《飞行事故分析中的计算机图形再现系统》，《国外试飞》，1993年3期，11-12，19页；刘军仓：《计算机在事故分析中的应用》，《飞行试验》，1993年4期，39-41页；刘军仓：《飞机空中解体的残骸运动轨迹分析方法及计算程序》，《飞行试验》，1994年4期，41-47页

⁴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http://cfe.zhiye.com/a/AboutUs>

已。另外，从梁金海说的“1983年集体装的‘飞行数据记录仪’，是检查飞行员飞行情况的，不是‘飞行数据记录器’，即黑匣子”这些话来看，他在这个领域谈不上有多专业，因为不管是“飞行数据记录仪”，还是“飞行数据记录器”，以及“飞行参数记录仪”和“飞行资料记录器”，对应的英文都是 flight data recorder (FDR)。实际上，专门用于事故调查的抗坠毁型 FDR，才可以叫“黑匣子”；至于非抗坠毁型 FDR，它们所记录的数据更多更全面，因而既可为考核飞行训练质量提供参数依据，也可为建立飞行档案、实现单机状态监测和确定单机寿命提供参数统计数据，还可为制定载荷谱、编制强度规范及新机设计、老机改型等提供科学依据。

当然，不能因为刘军仓的专业背景更强大，刘军仓的说法是出现在专业期刊上因而更权威，刘军仓提到了黑匣子的制造商和具体型号因而更好核查，而且刘军仓说法出现的时间距离事情发生的年份更近，就认为梁的说法一钱不值，毕竟中国早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古训。

那么，应该如何验证是刘军仓的说法正确，还是梁金海的说法正确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找到一架当时服役的三叉戟飞机，看看它上面装的到底是刘军仓说的“黑匣子”，还是梁金海说的用于检查飞行员飞行情况的“飞行数据记录仪”。虽然中国的三叉戟飞机在1990年代初就全部退役了，但对于发生在1988年8月31日的一起三叉戟客机空难所进行的事故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accident to Hawker Siddeley Trident 2E, B-2218,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31 August 1988》，提供了验证孰对孰错所需的全部证据。

1988年8月31日上午，民航广州管理局2218号三叉戟客机执行CA301航班任务，在香港启德机场着陆过程中偏出跑道冲进海湾，机组6人、乘客1人遇难，飞机报废，造成一等飞行事故。¹

香港民航处事故调查科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Division, Civil Aviation

¹《民航广州管理局三叉戟2218号机执行CA301航班任务坠毁》，通航产业网，www.ethcy.com/info/newsdetails.jspr?id=5355

Department (CAD) – Hong Kong) 对这起事故进行了一年零九个月的调查，并于1990年6月1日发布了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提到，失事的三叉戟-2E飞机是1973年制造的。¹该报告还提到，该飞机安装了Sundstrand公司制造的UFDR型黑匣子，该黑匣子记录了高度、空速、磁航向和垂直加速度这四个随时间变化的参数，该黑匣子从飞机残骸取下后就马上送到联合王国航空事故调查部 (United Kingdom 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Branch) 进行数据读取，并用Sundstrand公司产的复制记录器 (copy recorder) 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数据回放。²

显而易见，刘军仓文中的“美国S、D、C公司”乃其自创的“Sundstrand Corporation”的缩写，刘军仓所说的黑匣子型号UFDR与调查报告中披露的黑匣子型号UFDR完全一致。

那么，这个“UFDR”黑匣子是不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 (Hawker Siddeley) 在1973年造飞机时直接装上去的呢？不会的！按照英国1966年的航空法，黑匣子必须记录高度、空速、磁航向、垂直加速度和俯仰姿态这五个参数，1972年修改过的新航空法规定三叉戟型飞机所用黑匣子记录的参数在原有基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即发动机功率、襟翼位置和滚转姿态。³而“UFDR”黑匣子只记录了高度、空速、磁航向和垂直加速度这四个参数，显然是中方按照1982年空军司令部司科字第45号文件的要求向Sundstrand公司定制的这种黑匣子。

还可深究的是，这架失事三叉戟飞机上是否装了梁金海所说的那种可记录更多参数的“飞行数据记录仪”呢？绝对没有！否则事故调查报告不会对它只字不提。

顺便一说，Sundstrand公司在1999年被联合技术公司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收购，并与联合技术公司旗下的Hamilton Standard部门合并组成了

¹Accidents Investigation Division,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CAD) – Hong Kong: 《Report on the accident to Hawker Siddeley Trident 2E, B-2218,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31 August 1988》, p7

²《Report on the accident to Hawker Siddeley Trident 2E, B-2218,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31 August 1988》, p16

³蒋健：《林彪座机上有黑匣子吗》，《文史精华》，2014年1期，68-70页

Hamilton Sundstrand 公司¹，该公司的中文名叫“汉胜公司”，在百度上一查便知其业务范围。

康庭梓的说法有人证和物证吗？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民航处事故调查科的事故调查报告多次提到舱音记录仪（CVR），比如，“The aircraft was not equipped, neither was it required to be equipped, with a cockpit voice recorder (CVR).”（蒋健译文：该飞机没有配备 CVR，按规定也无需配备 CVR。），又比如，“There were no surviving flight deck crew and the lack of a CVR, coupled with the small number of parameters recorded by the UFDR, severely hampered the ability of the investigation to determine the sequence of events on the final approach.”（蒋健译文：飞行舱内的机组人员无一幸存、没有 CVR，加上 UFDR 所记录参数的数目过少，严重妨碍了确定最终进近作业顺序的调查。），再比如，“A CVR would doubtless have been able to provide valuable clues to the cause or causes of this accident, as would the recording by the UFDR of additional parameters such as pitch, roll, flap position and engine thrust.”（蒋健译文：倘若配备了 CVR 的话，它无疑能够提供本次事故原因的宝贵线索；倘若 UFDR 记录了诸如俯仰姿态、滚转姿态、襟翼位置和发动机推力等额外参数的话，那么它也无疑能够提供本次事故原因的更多宝贵线索。）²

这也就是说，这架 1988 年的三叉戟-2E 型飞机上根本没有 CVR 的踪影。

然而，在康庭梓笔下，1971 年的 256 号三叉戟-1E 型飞机上的 CVR 可是活灵活现！

请问康庭梓先生，您能提供相关的人证和物证吗？

康先生或许会把前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作为其“人证”，不过，那个老毛子可从来

¹en.wikipedia.org/wiki/Sundstrand_Corporation; en.wikipedia.org/wiki/Hamilton_Sundstrand

²《Report on the accident to Hawker Siddeley Trident 2E, B-2218,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31 August 1988》，pp18,44

没说过：“256号专机的语音记录器是一个扁平的长方体，长约40厘米，宽7-8厘米，高约15厘米，它安装在前驾驶舱领航员后面的无线电设备专用架上。”¹

余 论

香港的事故调查报告还表明康庭梓关于早期黑匣子的其它一些说法也不实：比如，康庭梓说：“林彪专机256号的黑匣子中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是直径约15厘米的扁圆状物体，安装在飞机尾部的垂直安定面内。”“安装在飞机尾部的根据在于，纵观历来失事的飞机，其尾部的损坏程度一般较小，将事故记录器放在那里相对安全一些。”²然而，在香港失事的那架飞机的黑匣子实际上是装在机头或者靠近机头位置的，是从海水里捞出来的。³又比如，康庭梓引用所谓的巴方教员的话说：“只要飞机发动机在工作的情况下，黑匣子就会自动打开，在飞机驾驶舱内，没有任何开关可以控制黑匣子的工作。”⁴实际上，UFDR黑匣子的电源是通过安装在主起落架上的接近开关（squat switch）控制的，这意味着只要飞机起落架触地，黑匣子就停止工作，尽管当时的通常做法是利用手刹或者发动机的起动电路来控制黑匣子的工作。⁵

至于康庭梓所说的“飞机事故记录器上记录着以下各方面的数据：属于飞机发动机的数据有：温度、推力和转速；属于飞行状态的数据有：飞机的飞行高度、航向、速度、升降速度（每秒钟飞机上升或下降的米数）和加速度等”⁶，笔者确信，对照英国1966年航空法的规定，他至少多说了三个参数、说错了一个参数；对照英国1972年航空法的规定，他至少说错了三个参数。

¹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262页

²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261-262页

³《Report on the accident to Hawker Siddeley Trident 2E, B-2218,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31 August 1988》，p16

⁴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259-260页

⁵《Report on the accident to Hawker Siddeley Trident 2E, B-2218,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31 August 1988》，p17

⁶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262页

事实上，康庭梓承认他没有见过 256 号三叉戟专机上的黑匣子，而且他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说见过 256 号那批三叉戟飞机上的黑匣子的机务人员，可他却绘声绘色地描述 256 号三叉戟上黑匣子的外形，致使无数像林豆豆、王海光、舒云这样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坚信 256 号三叉戟专机是有黑匣子的，这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是有害无益的。

最后，笔者谈一下余汝信先生对黑匣子的调查。

在采访空军专机师的老人后，余汝信撰文说：“据空军有关资料手册明确记载，三叉戟 2E 型飞机装有型号为 PV726A 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2 个（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机务参谋业务手册》，1975 年 10 月，页 380-381）。手册中记载的 2 个是否包含了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并未明确。至于三叉戟 1E 型飞机是否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手册中未有记载，笔者也未有见到相关的其他文字材料。”“就三叉戟飞机的黑匣子问题，笔者专门请教了空三十四师当年的有关机务人员。据时任空一〇〇团一大队机务中队中队长的包朝山称，三叉戟 2E 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但没有语音记录器。三叉戟 1E 他不太清楚（三叉戟 1E 配属一〇〇团三大队），但从三叉戟 2E 的配置可以推断，即使 1E 有飞行数据记录器，也不可能有语音记录器（访问包朝山记录，2016 年 1 月 11 日）。惟据时任空三十四师工程部助理的侯文仁告诉笔者，三叉戟 2E 不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有语音记录器。至于三叉戟 1E 是否配置有以上两者，因事隔多年，已没有什么印象（访问侯文仁记录，2016 年 1 月 13 日）。”¹

那么，PV726A 是否如余汝信猜测的那样，由数据和语音记录器两部分组成呢？当然不是！PV726A 确实有两个记录器，一个是记录法定数据的黑匣子，另一个是记录更多数据的 QAR。

QAR 是 Quick Access Recorder (快速存取记录器) 的缩写，具有不可循环记录、记录数据比黑匣子多、不带坠毁保护装置、数据便于存取等特点。QAR 主要用于飞机的日常机务维护、飞行考核等需要。

¹余汝信：《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南方周末》，2016 年 3 月 31 日，副刊 E29

事实上，三叉戟飞机是世界上第一种配备了 QAR 的客机。最初的 QAR 对 13 个变量进行采样，将它们转换成某种数字格式并存储在磁带上以供地面设备分析 (The Trident was the first airliner fitted with a quick access flight data recorder. This sampled 13 variables, converted them into a digital format and stored them on magnetic tape for ground analysis.¹)。

在英国，Davall 公司研制的 QAR 当时最出名，它所用的磁带 0.5 英寸宽，每盒磁带由七条音轨组成，起码可以记录七个小时的数据。在飞行时 QAR 也可以更换磁带，只要插入新磁带就会把新数据转到新磁带的第一条音轨上去记录。当现有磁带的第七条音轨在使用时，飞行舱前面板上的一个指示灯就会闪亮以提醒飞行员注意。²

而 PV 726A 则是英国乃至全球的第一种机载综合数据系统 (airborne integrated data system, AIDS)，从 1968 年夏起，它开始用在英国欧洲航空公司 (BEA) 的三叉戟以及其它类型的飞机上。PV 726A 这种机载综合数据系统到底由哪些部分组成呢？前面提到的那篇关于英国黑匣子设备的综述一开头就提到 PV 726A 并介绍了其组成：It consists essentially of a data entry panel which permits the insertion of flight identification data, self-test facilities, ON/OFF switching and fault indication, an acquisition unit, transducers, DFDR (digital flight data recorder) or accident recorder, and the quick access recorder.³ (蒋健译文：它主要由一块允许插入飞行识别数据的数据输入面板、自检设施、开/关电门和故障指示灯、一套数据采集单元、若干变送器、DFDR(数字化飞行数据记录器)即事故记录器、以及快速存取记录器所组成。)

此处的飞行识别数据指的是飞机注册号、飞行航班号、飞行日期、起飞时间之类基本参数。

¹en.wikipedia.org/wiki/Hawker_Siddeley_Trident

²"Flight Recording in the UK: 2. Equipment",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52 Iss: 4 p7, April 1980

³"Flight Recording in the UK: 2. Equipment",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52 Iss: 4 p5, April 1980

显然，每次飞行前、飞行中或飞行后，空地勤人员都不可避免要与 PV 726A 的数据输入面板、自检设施、开/关电门和故障指示灯以及快速存取记录器打交道。

笔者曾问包朝山老先生，即康庭梓回忆录中提到的特设专家¹，是否见过三叉戟-2E 型飞机上的黑匣子？他说见过 FDR，没见过 CVR。笔者又问是 1980 年代见到的 FDR，还是 1970 年代见到的 FDR？他说在 70 年代就见过。笔者再问：有没有 FDR 的型号，有没有保留它们的说明书或者图片？他说都没有。最后，笔者追问：“您是否操作或者维修过黑匣子？”他明确回答：“没有！”²

于是，笔者断定，包老先生声称在三叉戟-2E 型飞机上见过的黑匣子实际上是刘军仓先生所说的在 1983 年才安装的美国产 UFDR 型黑匣子，绝对不是英国产机载综合数据系统 PV 726A 所带的采用不锈钢丝循环记录的 1192 型黑匣子；因为年代久远，他记错了初次看到 UFDR 型黑匣子的时间。实际上，余汝信采访过的空军专机师老人都承认：“三叉戟飞机无论是 1E 型或 2E 型，进口时均没有同时进口黑匣子解码设备，也没有进口黑匣子的维护、校验设备。故而，机上即使有黑匣子，它的工作情况、完好情况从来没有人要求检查过，工作与否，也从来不知道。”³遗憾的是，余先生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故而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¹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374 页

²2016 年 1 月 11 日上午，在西郊机场宿舍区对包朝山的访谈。

³余汝信：《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南方周末》，2016 年 3 月 31 日，副刊 E29

【史实辨析】

“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考

——兼谈王海光的“历史生动性”

蒋 健

来自远方的质疑

不久前，一位研究文革的友人来信问：“网上见到一篇文章，说是毛南巡时，消息传到北戴河，‘林彪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很紧张，曾到叶群房间与之强行发生性关系。’仁兄知道其来源吗？按网上的说法，是张宁所言，可是我遍查张宁的书也没见到这个故事。林彪早已与叶群分居，估计那时连性欲都没有了，如何还能‘强行发生性关系’？”

笔者答：“明确这么说的，应该是中央党校王海光前些年的一篇综述文章，是关于这些年来对林彪事件研究的，登在《战略与管理》上，他说林得知毛的南巡讲话后很紧张，就到叶的房间与叶强行发生性关系。我觉得王的说法应源于汉纳姆的调查，汉纳姆采访过张宁。因为有个蒙古人告诉汉纳姆在叶群尸体的上衣兜里发现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所以他问张宁是怎么回事，张宁就说了几种可能性，其中一个就是当时林、叶之间还有性行为……”

友人则向笔者解释：“如果汉纳姆确实对张宁有这么一个访谈，他们之间的交流应该有第三者在场。我和张宁有多次交流，这些情节从未听闻过。张宁有一次提及在香港见到汉纳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深谈。而且1994年1月23日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的那篇著名报道，即Solving a Chinese Puzzle，涉及到张宁的部分，根本没有那方面的内容。”笔者见友人似有不信，便说：“国内介绍的汉纳姆采访，有多个版本，尽管作者都是与汉纳姆相熟的李安定。李安定是《环球》杂志记者，孙一先的回忆录提到过他1994年的一篇有关报道。”

查 证

与友人交流后，笔者随即查找了国内有关彼得·汉纳姆调查的报道文章，证明笔者答友人之问所言非虚，李安定的有关文字如下：

“一名被调查者告诉彼得，他对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电话叫起，10分钟后一辆汽车将他带到了安全部，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人给他一张印着英文的纸片，让他立即翻译成蒙古语。看着纸片，他十分惶恐——这是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上面写着药效和服用方法。看过译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后他们告诉他，**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彼得明白他的意思，按常识推算，叶群已经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否在飞机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问。”¹

“彼得突然问张宁，叶群是不是到了绝经期。张宁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叶群当时确实还有生育能力。她回忆说，**在北戴河，林彪因获知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时的秘密讲话而坐卧不安**。有一天，他很反常地去了叶群的卧室。次日，叶群着急地去找大夫，问是否可能因此怀孕，大夫作了检查，才让她放了心。于是，彼得告诉张宁，在坠机现场的女尸口袋里发现了避孕药，并道出他的疑问：叶群会不会经常服用避孕药？张宁说，不大可能，因为她非常爱惜身体，会害怕避孕药的副作用。但林立果有时带着避孕药，也许他把避孕药塞进叶群的口袋里。”²

李安定还证实汉纳姆懂中文：1994年，“调查纪实发表的时候，彼得和苏珊还在北京工作。我曾为此多次采访彼得，采访中我对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印象颇深。**彼得谙熟中文，对我的文章所涉及的全部事实进行了字斟句酌的推敲。**”³

¹李安定：《林彪头骨今安在？》，《湖北档案》，2004年11期，34页

²李安定：《林彪头骨今安在？》，《湖北档案》，2004年11期，35页

³李安定：《揭开林彪当年叛逃坠机内幕 林彪头骨今安在》，news.sohu.com/20040913/n222011369.shtml

另外，王海光说法的源头确实来自张宁，他的原话是“关于叶群尸体上带有避孕药的事情，张宁对汉纳姆说：林彪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很紧张，曾到叶群房间与之强行发生性关系，叶群害怕怀孕还找过大夫。”¹

显而易见的漏洞

在汉纳姆笔下，那位当年担任英语翻译的受访者说，“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张宁说，“林立果有时带着避孕药，也许他把避孕药塞进叶群的口袋里。”

然而，当年到过林彪座机坠机现场的中国驻蒙古使馆二秘孙一先是这样描述叶群遗体的：“全身衣服烧光，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左大腿有白内裤残片一缕，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臀部贴着裤裆残片，右臀往下有裤管残片。”²结合孙一先拍回的叶群遗体照片及其文字描述，可知叶群的遗体上是不可能还有什么衣服口袋的。

如果说孙一先并非第一时间到达坠机现场，他提供的信息还不够权威的话，那么，还可以看看当年蒙古官方调查委员会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对叶群遗体的有关描述：“带着一边被烧的浅色绸缎胸罩，臀部之下残留蓝色裤子的布片。”³而且该报告所附的在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及物件清单里并没有避孕药及其说明书。

这意味着那位当年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的受访者的话很不靠谱。

历史的生动性乎？

随后，笔者把查到的上述证据和反证发给了友人，并附言说：“李安定的文章在发前给汉纳姆看过，所以说，如果是八卦，应该是汉纳姆或者其采访对象，蒙古外交部的那位

¹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战略与管理》，2013年1期，www.cssm.org.cn/view.php?id=32859

²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20页。

³《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blog.sina.com.cn/s/blog_15e2c94500102wxpo.html

英语翻译和张宁八卦，特别是张宁那句‘林立果有时带着避孕药，也许他把避孕药塞进叶群的口袋里。’太八卦了！从孙一先拍的现场照片和他的文字描述，以及余汝信最近搞到的蒙古坠机调查报告看，叶群身上穿的衣服基本烧光了，哪里还会有口袋装着避孕药及其说明书啊？当然，张宁说了也不算，因为她根本不可能在现场。依我看，王海光这么说，收的是一石二鸟之效：一是丑化林彪，二是哗众取宠。”

友人回复说：“多谢仁兄查找有关资料。按照年龄推算，1971年的叶群应该51岁了。这个年龄不仅过了生育的年龄，且很可能到了更年期。王海光有意黑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其《折戟沉沙》一书中，谈及林彪建国初期病重时，王海光借傅连璋之口说，要叶群节制性生活。林那时病的连路都走不了，哪里会有什么性生活？！”

由是笔者联想到王海光曾经对一些史学著作和作者的批评：“于史实之外，施之于作者的个人推断和合理想象，平添一些情景描述和人物心理分析，以求得**历史的生动性**。但这种凭借合理想象得来的历史生动性，最容易误导不熟悉历史的读者。这种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仅举一例：有一位老将军请一个文学青年（指肖思科——笔者）整理他参加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个细节是，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写了一个证明叶群是处女的条子。这本是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匿名信写的。但这位文学青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想象力极为丰富，用了三四页的篇幅写叶群生性放荡。上中学时就已经失贞，在延安又和陈伯达等人吊膀子，继而色诱林彪，在新婚之夜又暗藏了一个带血的短裤冒充处女……（《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68-71页）作者从人物动作、对白都是描写得栩栩如生，犹如当夜是在现场窥视一般。”¹

然而，从“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的描述来看，王海光也在追求“历史的生动性”，这表明他对肖思科的批评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难道“历史的生动性”非得要靠“性”来实现吗？■

¹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炎黄春秋》，2007年5期，60页。

【读者来信】

1. 横泽泰夫谈老舍专辑

收到了第165期《记忆》老舍专辑，我刚刚读完了第一篇文章《“听话出活”的启示——老舍投湖五十周年》。我虽然读过老舍的几篇作品，可是只读了本期第一篇文章就知道我对老舍的认识多么粗浅。我又想起几年前访问老舍故居时的冲击。放在那里的笔记本上我发现谩骂老舍的短文，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到现在还有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

2. 范世涛谈“红八月”的自杀

第165期大作开头部分提到“在这段时间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市的非正常死亡1772人。”官方统计的1772人是1966年8月5日至9月23日北京城乡被打死的人数，并不是包括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这段时间北京很多人自杀。如果统计包含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结果会远远大于1772人（我想会超出一倍）。但官方尚未公布相关统计。■

3. (荷兰) 庄菁瑞谈与老舍相关的往事

乍一看本期导读，还以为你们为了纪念老舍的死做一期缅怀文字，有些诧异。细看之下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借题发挥”说自己的话。

我记忆中的八月也有个与老舍相关的日子，85年的8月25日周日，北新桥幽州书屋（老舍书“专卖店”，他夫人儿子经营的，开张十几二十年了）开张，老舍夫人和儿子参加开张仪式，副市长陈昊苏也来了，和普通人一样挤在书店门口等开门。我和他紧挨着，衣服贴衣服，要不是身边另一位“老舍读者”问他是不是陈昊苏，而他承认了，我都不敢相信这个和我几乎鼻子贴鼻子的人就是“现任”副市长。想想那时再看看现在，今天说这

个就像唠上辈子的事。呵呵。当时不明白为何开张找25日这样的日子，后来才意识到可能是为了纪念老舍24日的投湖。那时的我和参加书店开张的众多读者一样，都是老舍的粉，为他的死愤愤不平。多年之后才全面了解他49年来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夫人儿子的冷血无情。这一家人够可以了，他这样的死法也不算冤，冥冥之中自有因果。

吴老师的文写得好，在我看来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最后一句：如果老舍先生九原重坐，还会“听话”？还会“出活”吗？我的回答是：会，一定会！看看今日大陆的现状，不用费劲就能找出一堆同类人。我身边就有不少。即便历史重新走一遍，还会是一样的结局。没有第二个可能。这就是这个民族真正的悲哀之处！■

4. 李素白、郭力、李辅谈纪念老舍

文革中冤魂无数，难以忘怀，历史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四川 李素白

老舍之死还有不少可以研究的东西，可惜愿意出来说的人太少。■

北京 郭力

老舍以生命抗争，维护人的尊严，铮铮铁骨，令人敬佩！沉痛悼念伟大的灵魂！■

山西 李辅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慕太冲

本期校对：蒋健

本期版式：华雨